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华民族 3

 **eBOOK**
内网资料 免费下载

一、埃德加·斯诺及其《西行漫记》

在外国人的心目中，中华民族是一人颇具神秘色彩的民族。比如它的民族传统、民族精神，还有它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特别是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更是使外国人感到是个谜。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通过他对中国革命的多年的实地考察，对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革命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把毕生精力用在研究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上，一生中除为欧美报刊写作通讯稿以外，还出版了了 11 本著作，其中大部分著作是和中国问题有关的。他在书中描述了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介绍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和革命业绩，记录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要谈话，报道了解放区的创建和新中国的成就。而其中最著名的，则是他 1937 年写成，由伦敦戈兰茨公司于当年 10 月出版发行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这部不朽名著了。该书始终是很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以后，它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读物。它在全世界有亿万万的读者，影响是广泛的。它是国外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初版《西行漫记》除了有关西安事变和关于朱德的部分引用尼姆·韦尔斯的笔记材料外，都是他亲自采访的第一手资料。

斯诺在中国的西北之行，正值中国和世界局势大转变的开端。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艰苦奋斗的结果，而这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由于斯诺惊人的洞察力和锐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中国问题的本质。因此，他的这本书与他齐名而誉满全球，成了纪念他的最恰当的丰碑。

（一）中国之行

埃德加·斯诺 1905 年出生于美国坎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后来，他有幸上了学，还考入了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大学毕业后，即开始了毕生所从事的新闻工作。他以自己的聪明多才、朴实无华和诚挚勤奋，在坎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初露头角。后来他当了海员，历游中美洲，最后到了夏威夷，仍然为美国的一些报纸供稿。1928 年，他来到中国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1930 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他在中国西南各省作长时间的旅行、采访，徒步经过云南省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访问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领袖。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上海，目睹了 1932 年淞沪战争和 1933 年的热河战争，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1933 年 9 月，用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真相。在这以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了中国语文。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他编译了一部英文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1936 年出版），这本小说选是向英语国家介绍中国新文学的最早选集之一，斯诺也是较早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外国人之一。

如前所述，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斯诺带着许多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中国革命和战争的疑难问题，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他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首先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红军与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宁夏南部的预旺县，在采访了红军指战员后，又冒着炮火折回保安，由保安顺利地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在北平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10月，该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11月已发行了5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就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飘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斯诺除了对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为原书所没有的大量图片以外，还为中译本写序言。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西行漫记》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现在，《西行漫记》在中国仍是人们熟知并爱读的一本书，斯诺永远是受中国人爱戴的朋友。

由于他在西北红色区域4个月的冒险采访中引起的激情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致使斯诺用了他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继续作了深入的探索研究和宣传报道，并相继发表了《为亚洲而战》（1941年出版）、《人民在我们一边》（1944年出版）、《红色中国杂记》（1957年出版）、《复始之旅》（1959年出版）、《今日红色中国》（1962年出版）、《漫长的革命》（1972年出版）等8本书，向全世界真实客观地介绍了中国人民艰巨、宏伟的革命事业，促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

（二）“我要揭开这个谜”

埃德加·斯诺1928年踏上中国国土时，正是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在此以后的7年中，也就是在他冒险到西北“红色中国”实地考察前，他耳闻目睹的，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犯的罪行，就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中国人民的镇压，而这些又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在正当理由的幌子下进行的。他还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及1933年2月的热河战争，尽管国民党倚仗外国势力的帮助对弱小的红军组织了5次大的围剿，并在全国范围内连续不断地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捕杀，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忱却更高涨了，中国工农红军却更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更深入人心了。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不但坚强地经受了千百次战斗、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以及象爬雪山、过草地那样艰难的长征，突破国民党成千上万军队的拦截，

胜利地到达中国西北的新基地，而且，以其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和真心实意的扎实行动，掀起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高潮，它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信赖和支持，从而使得红军一天天在壮大，根据地一天天在扩展，而不是象南京政府多次宣传报道的那样：“赤匪”已剿尽，“红祸”已铲除。斯诺感到“这是一个难解的谜”。而要解开这个谜，就必然实地到红色中国去看看。对于他去西北考察的具体的想法和原因，他在《西行漫记》中是这样表述的：

“我在中国的7年中。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指国民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9年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敢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1927年11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末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1927年以前，共产党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成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成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万成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相象，哪些地方不同？……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用——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

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 25 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辑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象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死命，可是又在新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 9 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取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呢？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 50 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 1935 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末共产党到 1937 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完蛋了，那末，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反共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斯诺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而

此举无疑是困难重重并有生命危险的。斯诺说：“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实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

以上这些，就是埃德加·斯诺对中国革命和战争问题的种种疑问，就是他为什么要到“共匪”控制区——红色中国去冒险的真正动机。这——不仅使人们看到了他这个正直新闻记者在为真实、客观、公正地把中国革命的现状介绍给全世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也使人们看到了他为揭开“中国革命问题之谜”而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所经受的磨难（在冲破国民党队封锁过程中差点丢了性命）。也正因此，他实现了1936年6月至10月的红色中国之行，使他渐渐揭开了百思不解的谜底，写出了《西行漫记》这部不朽的名著，得以向全世界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中国革命的现状。

（三）“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希望”

在红色中国，斯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热情慷慨的款待。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中，他心中的疑问得到答案。他的思想感情和分析判断事物的世界观，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希望。他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在《西行漫记》中作了详尽的介绍和阐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们“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

斯诺看到，在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红军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蒋介石悬赏8万元缉拿的周恩来，是他到苏区后见到的第一位高级领导人。斯诺在谈到对周恩来的印象时说：“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诬蔑共产党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

斯诺在苏区见到的第二位高级领导人，就是“苏维埃的掌权人物”——毛泽东。斯诺说：“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

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当机立断的魄力。”“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给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富有历史的意义，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还记下了朱德的故事。他写道：朱德的故事——“是许多人不能想象的最最生动的人生经历的辉煌记录——这是一个大胆无畏和大公无私的故事，一个无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个难以相信的故事，一个为着忠于一个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主义而丢弃个人享受、财富和地位的故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們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核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朱德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个性几乎能立刻博得人们的爱戴。看来产生这种个性的由来是他的谦虚，而这种谦虚也许又是渊源于他个人诚实可靠的品质。……反正朱德不是圣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间，在穷人——毕竟他们占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间，他是个深受爱戴的人，他在一段时间内，曾经高举解放的火炬，在那些为中国的人权自由而斗争的人中间，他的名字已经永垂不朽。”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还以浓墨重彩赞美了彭德怀、徐海东、徐特立、林彪等共产党领导人。他还谈了对红军的看法：“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这就是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农红军的印象和评价，就是他得出“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希望”的依据之一。

第二，“红军是人民的军队”。

对于这点，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表述最多，这也是他得出“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希望”的最重要的依据。他说：“共产党在西北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象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中，对农民最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有四项：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红军在农民中间得到拥护的一部分原因，因为红军很少像其他军队那样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和剥削工具，而一般

《西行漫记》第 62 ~ 70 页。

《西行漫记》第 321 ~ 323 页。

《西行漫记》第 253 页。

是在前线，在那里为自己的口粮作战，应付敌人进攻。”“红军对人民很好，不抢不打，不像白军。……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打地主和帝国主义。……红军帮助穷人。这里大家都一样，不象在白区，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求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不喜欢呢？”“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所以壮大是因为有人民的帮助。”

第三，他们是抵御外强侵略的民族脊梁。

对于这点，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作了很精彩的表述。他看到中国共产党 1933 年就提出了对日宣战的主张，而南京政府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对红军“清剿”，他赞誉红军为开赴抗日前线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壮举，以及共产党人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为促成抗战形成而劝说不杀蒋介石时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他写道：“由于南京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中国把五分之一的领土，40%以上的铁路线，85%的荒地，一部分的煤，80%的铁矿，37%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 40%左右的全国出口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那么南京的 9 年反共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西北当局最近曾在一个反对第六次反共‘清剿’运动的宣言中，总结了这些结果。它告诉我们，第一次‘清剿’运动时，满州落入日本的手里，第二次上海遭到侵犯，第三次放弃了热河，第四次失去冀东，而第五次‘肃清残匪’运动中，冀、察的主权又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因此，西北方面认为，蒋介石最新的剿共与日本侵略绥远北部发生在同一个时候，绥远必然就要丢失。”斯诺在谈到抗日将士的时候赞誉说：“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象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在谈到“西安事变”时，斯诺写道：“在这里，共产党代表团起了极大作用。”共产党人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是停止内战的需要。“如果他（指蒋——引者）被杀，内战不可避免地会大规模爆发，国共内战的十年僵局就会大大延长，要实现抗日民族阵线的希望就会变得渺茫。这样的前途，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吃亏的只是中国，得利的只是日本。”斯诺看到：“红军是抗日的。”他们才是真正的抵御外强的侵略的民族脊梁。

第四，他们实行了崭新的社会制度。

斯诺在红色中国考察了工业、农业、兵营、学校、抗日剧社、兵工厂和列宁俱乐部，还对“苏维埃社会”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了认真的考察采访，在与南京的国民政府进行了比较后，他认为，红色中国实行了崭新的社会制度。他写道：“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出的成就。事实上，我一进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从来没有听到

《西行漫记》第 195、198 页。

《西行漫记》第 56~57 页。

《西行漫记》251 页。

《西行漫记》第 74~75 页。

《西行漫记》第 164 页。

《西行漫记》第 379~380 页，

过。……缠足和溺婴是犯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关于‘共妻’和‘妇女国有化’的谣言，一望而知是荒谬可笑的，不屑一驳。但在结婚、离婚、遗产等方面的改革，按照中国其他地方的半封建法律和习惯来看，本身就是很激进彻底的。婚姻法是有这样有趣的规定：“禁止婆婆虐待媳妇、买卖妻妾以及‘包办婚姻’的习惯。”“现在可以证实几点重要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了红军所取得的人民拥护的基础是什么。土地给重新分配了，捐税给减轻了。集体企业大规模地成立了。……失业、鸦片、卖淫、奴婢、卖卖婚姻都已绝迹，和平地区的工人和贫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设一个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

基于以上各点，斯诺看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苏维埃“才是真正中华民族的希望。”同时，他也据此得出“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结论。

（四）“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埃德加·斯诺 1936 年 10 月回到北平后不久，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统一抗战的好局面。对此，斯诺倍受鼓舞。因为他与在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的接触中思想感情发生了极大变化，已自觉地站到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他把这种感情和认识也都写进了《西行漫记》中，并肯定地断言“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第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抗拒外辱的优良传统。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绚烂历史”，记述了中国的孔子和秦始皇，记述了“地球上最宏伟的砖石工程——中国的万里长城。”还简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插叙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反日义勇军和张学良部队的抗战行动及 1932 年淞沪战争中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记述了“西安事变”后在西北发生的大好局面：“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代表开联席会议，成了公开的盟友。14 日宣布成立抗日联军，有 13 万东北军，4 万西北军和大约 9 万红军。……在部队里，政工人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抗日宣传。几乎每天都举行群众大会。有一次参加者有 10 万多人。在所有大会上，口号都是团结抗日、停止内战。”

第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斯诺写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认为，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世界，亿万工人都在关心地注视着他们，到时候就会仿效他们的榜样，就像他们自己仿效大俄罗斯同志的榜样一样。”他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国际社会主义胜利的一部分，

《西行漫记》第 201 页。

《西行漫记》第 159~194 页。

《西行漫记》第 336~367 页。

《西行漫记》第 335 页。

因为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帝国主义最强大的一个根据地。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非常迅速地发展。如果我国遭到敌人的征服，我们就丧失一切。”斯诺指出：“现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已经深化，中、日战争扩大为法西斯主义和国际和平战线的世界斗争，在最近将来，是可以想象得到了。”

第三，中国必将赢得抗战的胜利，必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斯诺在《西行漫记》1938年中译本序言里强调指出：“通过红军的经验所得到的一种客观教训，就是有组织的民众——尤其是农民大众——在革命游击战中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我记起毛泽东向我说过一句话，因为毛所预测的许多事，现在已变成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把这句话再重述一遍。他说：‘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争得自由，而成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得行动自由，也同样地武装了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的。’毛泽东再三重复说，为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自己起来，完成统一，抱定抗战决心，是十分必要的。其他一切都要从这统一和决心来决定。只有中国人民自己能够使中国打胜；也只有中国人民自己会使中国失败。不管打了多少次胜仗，日本现在已在失败和最后崩溃的路上走着——即使要在几年之后，而且中、日双方都受极大痛苦，日本军阀才会失败，但这总是不免的。”“还有一点后来也是肯定的。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最后终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因而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这就是斯诺的结论。

（五）“我热爱中国”

埃德加·斯诺 1936年6月至10月的红色中国之行，使他这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儿童团员，有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正如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所说：“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

《西行漫记》第76、374、序言第8页。

《西行漫记》序言第9~11页，第406页。

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但是这自然并不是说，共产党或红军或红军领袖，对我自己对于他们以及他们的工作的意见或印象，可以负责。因为我和共产党并无关系，而且在事实上，我从没有加入任何政党，所以这一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

基于这种认识，也因为这个缘故，斯诺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中，思想得到了升华，认识产生了飞跃。他写道：“历史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每一个人又是历史的一部分。”他自己确实受了中国历史的影响。他开始懂得世界各地人民受压迫的原因。他把自己的贫苦出身同中国人民的贫困生活联系在一起，并开始把自己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是中国使他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从此，他对中国人民，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此以后的岁月里，他用了他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了深入持久的考察和报道。

1939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再次和毛泽东进行了谈话。这些对话后来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1941年斯诺对于皖南事变作了如实的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1942~1943年他又来过一次中国。在麦卡锡主义控制的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看作危险分子，不容许报刊发表斯诺的文章，他被迫迁居瑞士。他的护照也禁止去中国旅行。但他并没灰心，仍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写成并出版了《红色中国杂记》（1957年出版）《复始之旅》（1959年出版）两本书，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直到1960年6月，他得到我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解放后的新中国，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他把与两位伟人的谈话和观后感，写进了《今日红色中国》（1962年出版）中。1964年到1965年初，他再一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又接见了。1970年10月斯诺同洛伊斯·惠勒·斯诺夫人一同来华，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同毛泽东、周恩来会了面。12月18日他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

假如说，《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

1972年2月，斯诺刚回到瑞士不久，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应邀访问北京，揭开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总统来华的时候，斯诺准备以记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国之行。由于病魔缠身，未能如愿。1972年2月15日上午2点20分，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了。

当斯诺不幸病逝的消息传来，毛泽东主席于1972年2月16日即向斯诺夫人发去唁电：“获悉埃德加·斯诺先生不幸病逝，我谨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

中国人民心中。”周恩来、宋庆龄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向斯诺夫人发了类似的电文。“中国人民的朋友”、“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斯诺毕生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的最恰当的评价，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

斯诺在弥留之际，他在病中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发自心底的话：“我热爱中国。”

“我热爱中国”，这是斯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的真实流露，也是他毕生研究中国问题的所得。这种感情，在他当年去西北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接触时产生过；在他被国民党驱逐时掩藏过；在他再次踏上新中国领土时荡漾过。实际上，他早已把伟大的中国当作了他的第二故乡。因此，他留下了这样的遗嘱：把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内，即前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1973年10月19日，中国在北京大学举行仪式，斯诺夫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埃德加·斯诺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景色秀丽的未名湖畔。这是适当的。这里是他1936年去西北探险采访的出发点，也是他1937年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

埃德加·斯诺将和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一起永垂不朽！

二、斯诺夫人眼中的中国人

1937年，正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图谋消灭共产党的时候，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红色中国内幕》就是她以尼姆·韦尔斯的笔名在美国出版的关于这次访问的纪实性著作。作者在书中不仅以生动的笔触热情地歌颂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劳动生活、八路军官兵的英勇抗战和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而且真实地记载了她与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蔡畅、康克清等人的密切交往。斯诺夫人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不仅谈及了抗日战争期间她在西安、延安的经历，而且谈及了30年代她在上海、北京的情况。

（一）中国劳动阶级勤劳与智慧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我们的祖先，以其勤劳勇敢和顽强的精神，开辟生存和发展之路，以其聪明智慧和不懈奋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引起了世界著名人士的关注和赞扬，斯诺夫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在《红色中国内幕》中，她是这样写的：

“中国劳动阶级中不存在贵族。他们要求生活之少，给予生活之多，超过了任何民族的人民。他们的大脑和双手是如此的聪明灵巧，他们的忍辱负重与不息斗争精神是如此的难能可贵，他们在任何工作领域中都是那么才干出众，以致于理解他们，便是无条件地赞颂他们，便是希望他们挺身而出，并达到一个能在本质上赋予他们以绝对优势的高度。这个劳动阶级的人们，

在中国人口中几乎占了 90%。

“他们——无与伦比的中国农民、迹遍尽知的中国苦力、多少世纪以来便以其勤劳智慧使全世界为之惊叹。”

牺牲精神与集体主义精神自我牺牲是中国劳动阶级特有的美德，斯诺夫人非常赞扬中国人民的这种精神。她说：

“……为别人、为社会、或为将来牺牲你个人的利益。这是对‘精神’品质的考验。……他们（指中国共产党人——引者）今天正在大规模地传授这种品质，极力发展这种品质。”

“红军在延安没有酒喝，甚至没有茶，他们喝的是白开水。他们都是义务兵，没有薪水，都想尽量地牺牲自己的利益，为革命立功。”

斯诺夫人极其敬佩中国人民高度的凝聚力及集体主义精神：“我了解到，共产党人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在物质上，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民众，能够给的，只是一种精神力量，兄弟的情谊，或者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与民众‘生死与共’。由青少年组成的整个军队，会自愿地同民众生死与共（所有的红军士兵都是不领薪水的义务兵），会被消灭，但是新的军队就会随之而产生。在延安，动植物几乎不能生长，但人类却幸存下来。在这儿的黄土里，一种靠饥饿和危险而生存的精神力量正在觉醒。”

“最重要、最非同凡响的，是前线部队及其政治领袖们那种确实令人难以置信的集体主义精神。……后来，出现了一个奇迹的奇迹——我自己竟然成了这种集体主义精神的一部分。当我同年轻的红军士兵离开延安，步行 10 天，赶回西安的旅途中，我每天夜里都疲惫不堪，几乎不能爬进我的旅行床，然而我实际上每一天都忘记了我病得是多么厉害。”“这是一种高水平、高强度的精神力量。”

（二）革命家们“红军总司令”朱德

斯诺夫人于 1937 年 5 月的一天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热情欢迎。对于初见朱德的印象，她是这样概括的：“我同见到过他的每一个外国人都有着同样的看法：他立即令人喜爱。”

当月 21 日，应斯诺夫人的请求，朱德把一份简单的自传和关于红军发展的报告给了她，她为此十分兴奋，说：“非常荣幸，竟能从他自己口中获得此种报告，以纠正那些‘传奇’下面关于他的生涯的简单的叙述。”

朱德的温和、谦恭、正直和果断以及君子品质在斯诺夫人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说：“朱德是一个慈祥、和蔼、说话沉着、言行谦恭的人。他不会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因为他将自己的人格完全融入了自己的工作

《红色中国内幕》前言。

《红色中国内幕》，马庆军、万高潮译。华文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第 1 版，前言。

《我在中国的岁月》安危，杜夏译。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4 页。

《我在中国的岁月》第 304 页。

《我在中国的岁月》第 296 页。

《我在中国的岁月》第 307 页。

《外国人眼中的中共巨星》，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第 1 版，第 220 页。

《外国人眼中的中共巨星》第 220 页。

之中。”

“在我的印象中，朱德是全中国少有的心地善良的人物，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位少见的军人——战争在他看来并非一种建功立业而是一种结束苦难的手段。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宽宏大量、感情丰富的人。作为一位头发灰白、年过半百的老战士，他在真刀实枪的战火中度过了半世生涯，无尽头的中国内战中的悲惨故事都刻写在他那满脸的深深皱纹之中了。……朱德没有什么军人气概。你不可能想象他大腿边吊着镀金指挥刀的模样，就像你不可能想象，冯·兴登堡身着朱德的旧军服、脚踏他的网球鞋一样。朱德的动作温和、缓慢、从容不迫，全无一点粗暴之处。看上去，他就象一位入定的菩萨一样平和恬静。”

“与其说朱德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司令官，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民众的领袖。他的性格与习惯都是十分民主的。”

“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红军是一支非常年轻的军队；而对于这支年轻的军队来说，朱德就是坚毅精神的化身，是新旧历史相联系的中心环节。在最为落后同时又最为重要的中国内地，朱德从始至终参加了满清王朝倒台以来的全部革命运动。他生活在中国内地两个最落后的省份——云南和四川。当时，沿海的浪潮冲击着这些落后之地，引起了人们的反响。朱德和当代中国许多著名军界要员不同，他不是日本、俄国或德国的留学生。他的经验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内地民族土壤之中，他熟悉中国南北的山川地势和风土人情。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士兵们的充分信任及中国旧式将军的敬重。”

“在中国第一流的军官学校里，朱德接受过著名的共和派将领蔡锷的训练。接着，他到了中国和法属支那的边境上驻防，到了四川和云南的高山城堡。在这期间，他掌握了独具特色的游击战术。从而在后来为红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政治方面，他首先于 1909 年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为民主而斗争，接着他加入了国民党，最后他自觉地投向了共产党。1922 年，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党员之一。朱德到上海、北京和柏林寻找共产党的过程充分表现了他的独立精神和决断能力。由此他在中国的三次革命中都成了领袖人物。

“如果没有‘朱毛’这两位天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将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视朱毛为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火热的战斗之心——这给了他一生的动力。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条最高的原则，原因之一就在于朱德对政治领导的忠实与服从。从朱毛直到全体军官和政委之间都没有任何勾心斗角的行动。朱毛的合作不但不存在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哪个方面朱德都没有政治野心。他能听从命令，因而也能发布命令——在革命军队的领导中，这是很有意义的素质。”

“朱德的宝贵品格众所周知。他这种性格源于他的谦虚，而他的谦虚又

《红色中国内幕》第 103 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 103 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 104 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 105 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 105 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 105 ~ 106 页。

源于他独具的坚强意识与坦然正直。”

“朱德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德不盲目反对西方，他坦率、虚心、诚实公允。”

“极其意味深长的是，我们美国人公认朱德的品质”，“在他的晚年，朱德作为国家元首，被一些外国人称为‘老先生’——这就是他再次给予我们的东西：一切君子品质，对于我们西方的传统是多么珍贵！在我自己的心目中，我总是把朱德看作中国人称作的那种‘君子’，或‘完人’。”

“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个整体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甚至连中国的一些人也认为‘朱一毛’是一个人。毛泽东是智囊，是理论家，是‘主席’。朱德是心脏，是军队，以全部的才能看，是一位人民的领袖，人类物质的领袖，这两个人都是优质材料制成的，这就使他们分别在 80、90 高龄时，仍然能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元首。”

“红军中第一号善战的湖南人——彭德怀”

1937 年 4 月下旬，斯诺夫人离开了以延安为目的地的长途旅行，两天后抵达西安，当月来到三原，她称三原是“红星闪耀的地方”，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红军战士，并多次与彭德怀接触。5 月 2 日，他在经阳云阳给丈夫斯诺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我此时在三原附近的彭德怀司令部，昨天是五一劳动节，这儿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红军确实了不起，他们年轻极了，真令人难以置信。”

斯诺夫人对她与彭德怀的这次交往非常高兴，彭德怀的直率，粗犷、坚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

“那著名的彭德怀司令来访问我，他奇异地注视我，同我握手，不说一句空话。他把一切欢迎的应酬的话让都他的属下代表说了，而只跟我开始不拘礼节的谈话。他的态度尽管直率，但我总觉得这位红军中第一号善战的湖南人，是所有共产党员中一个最有趣动人的人物。”

“在苏维埃会议中，彭德怀的地位仅次于朱德和毛泽东。毛泽东是被当作在后面策划的一个神秘的天才，年高的朱德掌握着军权，彭德怀似乎要算是一个最接近军队生活的人。他常在前线活动，领导着他第一路的红军，或是代表着红军总司令朱德。”

“彭德怀必将成为中国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他混合了领袖的各种德性，这似乎最适宜于目前的历史需要。其他的领袖，无论是右派或左派，也许在军事上政治上更杰出，也许对于民族解放事业更有革命的热诚。然而他们的忠诚老实恐怕谁也比不上纯洁廉政的彭德怀。廉政精神是今天中国领袖最需要的一种德性，正同欧洲在同样紧急关头所需要的一样。”

“他对政治是同军事一样的了解和精明。他是一个军队的领袖，但他却

《红色中国内幕》第 106 页。

《外国人眼中的中共巨星》第 233 页。

《外国人眼中的中共巨星》第 235 页。

《外国人眼中的中共巨星》第 235 页。

《外国人眼中的中共巨星》第 269 页。

《外国人眼中的中共巨星》第 371 页。

《外国人眼中的中共巨星》第 327 页。

《外国人眼中的中共巨星》第 372 页。

能跟中国任何地方政府充分的合作——只要这政府不是腐败的。”

“彭德怀无疑是坚强的战士，但在他外表坚硬的皮肤下面，却有着一颗热烈的心，你会觉得他是非常温和地爱着他军队中的人。他宠爱着所有的‘小鬼’——他们也单纯地崇拜他。他没时间接见访问者，但他却跟‘红小鬼’在司令部中辩论，很庄严地跟他们交换着战略的意见。”

“当离开司令部时，我表示出对于红军前途的忧虑，彭用手击着桌子，象喊口号似地大声说‘你无须替红军担忧。红军是不可征服的！’”

“飞行军”的统帅——罗炳辉

罗炳辉，参加过讨伐陈炯明之战和北伐战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在江西率国民党吉安靖卫大队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任红十二军军长，这是一支流动作战部队，红军都称其为“飞行军”。

斯诺夫人十分欣喜接触到这样一位中国将领，罗炳辉魁梧的外表及他的朴素、勇敢、善战给了她难以忘怀印象：

“罗炳辉一看就是一位‘中国将领’，就像冯玉祥一样。他18岁便被誉为云南府的‘模范士兵’，这是毫不奇怪的。他在我曾经见过的中国人中是最魁梧的，长得又高又大，每一块肌肉都象钢铁一样结实。难怪他总是象一个胜利在握的拳击家那样，将对手击倒在地毯上呻吟不已。”

“我与生性快活的罗炳辉交谈时所感受到的乐趣，就同他本人感受到的一样多。他的神情坦荡的圆脸使我想起了笑面菩萨。……罗炳辉就出生在中国与印度支那接壤的云南省，云南是中国美丽的省份之一，高山峻岭、森林繁茂。因此，住在寸草不生的西北黄土高原上，罗总是流露出一股思乡悠情。只要一提起云南的花草树木，高山流水，罗炳辉就爱象冯玉祥提起东北时那样说‘还我山河’，思乡之情，溢于言表。”

“罗炳辉喜欢队伍生涯……他是中国人所喜好的关帝式的民族英雄，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他常常以智取胜，然而又敢于直捣敌人的心脏。”

“罗炳辉和朱德、贺龙及冯玉祥一样，喜欢穿朴素的衣服、过朴素的生活。他在本质上继承了中国的民主传统。他为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而骄傲。他视奢华金钱如同粪土。他喜欢过艰苦而危险的生活，喜欢吃士兵吃的饭菜，喜欢穿着草鞋和战士们一道徒步行军。事实上，他得以在这种生活中生存下来，便说明他具有一种统率士卒的天赋权利。”

“这位巨人的作战次数比其他红军指挥员多。”他说：“在3年战斗中，敌军的兵力总要比我的兵力多10到20倍。”

“黄埔军校的老战士”——徐向前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首批毕业生。红军元帅，历任红一军副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一二九师师长等。斯诺夫人久仰他的功名，她说“在延安我几乎逢人就请他们告诉我徐向前的故事。”斯诺夫人在延安期间见到了这位红军元帅。这次见面给斯诺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徐向前的文质彬彬

《外国人眼中的中共巨星》第235页。

《外国人眼中的中共巨星》第235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114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114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115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115页。

的气质和谦逊、温和、忘我工作的精神。她说：

“我原以为徐向前是一位气宇轩昂的纠纠武夫，可他看上去根本不像男人，毫无咄咄逼人的气焰。他是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眉目清秀。”“态度谦逊、拘谨、言语不多……他在35岁就已在长期的战斗中负过3次伤了。……人们都说他身先士卒，作战勇敢。”

“我向来就希望了解红军人士的个人生活，可在他面前我无能为力。他似乎一点也不关心自己。”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理想主义者类型的老革命家之一。”

“1924年国民革命开始以后到今天，徐向前几乎打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省份。他开始做政治工作，接着便完全献身于军事工作。我认为，作为4个不同苏区的领导人，他一定具有最丰富的经历。”

（三）中国革命的半边天

“中国妇女在红星照耀下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中国妇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下，处于被统治地位，“三从四德”把她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自由，没有主权。在延安，妇女享受着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生活权。这被斯诺夫人赞扬，使她感到：“中国妇女在红星照耀下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同时，新时期妇女的坚强、刚毅也使她极为钦佩。她说：在当时延安的“无产阶级政权中，妇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们不仅是经验丰富的革命战士，而且是苏维埃最高领袖们可爱的妻子与长期的同志。……她们确实是勇敢的红色战士，在大小问题上都敢于发表与大家不同的意见。她们时时走在先进的最前列。”

旧时期妇女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新时期中国妇女通过斗争获得了婚姻自主权，建立了一夫一妻的现代婚姻制。斯诺夫人说：对于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婚姻，苏维埃妇女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这不仅因为婚姻权利平等在东方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观念，而且是“新女性”为捍卫自己而牢固建立起来的一座战斗堡垒。她们的新型婚姻的成功一直是令人惊异的。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和工作造成的长年分居，苏区领袖在现代婚姻上仍然表现出最完满的忠诚。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尊重妇女的价值。这不是出于怜爱，而是因为她们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在红星照耀之下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即使他们不是中国革命中更出色的半边天，那么也是与男人同等重要的半边天。居住中国的侨民大多持这种结论——中国妇女要比中国男子更富有男性气质。即使是最顽固的排华主义者，对中国的妇女也不得不衷心地表示钦佩。”

中国妇女在革命中起着重大作用

中国妇女在延安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名正言顺地与男子同地位、同工作，

《红色中国内幕》第125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125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127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156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156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156页。

享受着同等权利。在革命斗争中，和男子一样冲锋陷阵，起着重要的作用。

“半边天”的力量引起了斯诺夫人的亲切关注：

“中国各阶层女性在其尚未因年老而变得保守之前，通常都是坚决勇敢的叛逆者，在革命运动中她们和先进分子并肩前进。在著名的中国学生示威运动中，女学生总占大多数。当警方与学生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时，女学生总是坚持到最后。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期间，女学生和工人一样活跃。当国民党右派纠集反动势力共同反对左派时，这些年轻妇女对他们毫不留情。……还有不少妇女毫不犹豫地进入被封锁的苏区，承担起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命运。”

“最先参加革命工作的中国妇女是女学生和小学教师，特别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如此。”“苏维埃运动开始之时，国民党右派纠集地主镇压农民运动之后，农村妇女即投入了战斗。”“...这些苏维埃妇女的生活经历给人留下了两个印象：首先，由刘群先、康克清和李坚贞的生活，可看到中国工农大众的苦难处境；其次，由蔡畅、邓颖超等人的革命经历，可看出中国知识界中柔弱的女学生所具有英雄主义和顽强毅力。”

三位女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中，涌现出一大批妇女干部，蔡畅、康克清、刘群先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锤炼出来的三位杰出的妇女先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妇女工作者，斯诺夫人对她们非常钦佩。

她说蔡畅是“共产主义妇女的导师”，“自从她有名的嫂子向警予1928年在武汉被杀以后，她就一直是中国最前列的共产主义战士。从国民革命时期到现在，她始终是一个最活跃的女革命家。在苏维埃首都，她的意见是最受人重视的。……我非常有兴趣地看到，15年来中国残酷的革命生活并没有摧毁这位妇女的精神。她在心理上是非常健康的。她当然有痛苦，还有对敌人的仇恨。这很正常，因为他们杀害了她那么多的亲密同志和亲人。从这样的苦难中死里逃生，她也没有变成一个漠视死亡的人，我实在难以理解。事实上，她是这样的富于人性，充满感情，既和善又亲切，就跟世界上所有母亲一样。……我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产生出像她这样优秀的女革命家和美丽的人。”

康克清女士被斯诺夫人认为是“勇敢的红色战士”，她说：“康女士之光彩夺目并非因为她是总司令朱德的妻子，她25岁时就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红军‘女司令’的称号。除了在湖北牺牲的贺龙的妹妹外，真正指挥过的红军的妇女只有她一个。……她平常感兴趣的也不是女权运动，而是和男子一样的指挥士兵作战的权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她有非常可爱的个性。”

无疑，妇女在中国革命中起着重大作用。斯诺夫人说：“当红军象慧星一样扫过中国西北的天空时，首先从沉睡中惊醒的是当地的妇女。这对她们还不仅仅是惊醒，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进入了她们的视野。”

《红色中国内幕》第157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158、159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167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167~169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185页。

（四）“共产党已经唤醒了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力量

斯诺夫人认为，中国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势力强大的日本面前，他们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她说：

“在今日的远东，一个迅速形成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核心事实是：如果45000万中国人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动员起来，他们就不仅可以获得本身的自由，而且还可以击败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反之，如果中国人民不如此，……那么新崛起的可怕的日本帝国主义就将占领广阔的中国大陆及其岛屿，并且将控制整个东亚，从而引起长期的民族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

斯诺夫人相信，中国若把人民动员起来，可以打败日本。她认为：“这个问题，共产党人已经在其本上自卫中成功地证明了人民的能力：第一，他们在保卫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时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做的事情吧：1927年下半年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朱德只有1200名革命士兵，毛泽东只有1000名富有反抗精神的工人和农民。但在4年之内，他们就建立了拥有900万人口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些苏维埃人成功地保卫他们自己这10年之久。当时，他们的敌人拥有先进武器与经济实力，就像现在日本与中国相比较一样。红军与超过自己实力10倍有时甚至20倍的敌人作战，就是因为有了人民的支持才立于不败之地的，……每当他们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就会有被他们的激烈战斗所激发起来的来自民众的新生力量，投入他们的受挫的队伍。这就像伟大的安泰一样：他愈是倒在地上，大地母亲就愈能给他以新的力量。对于共产党来说，人民就是安泰。”

中国革命必胜

拿破仑曾预言：“中国是什么？是一头躺着的昏睡的雄狮。让它醒来吧！一旦醒来，它将震撼世界。”

斯诺夫人说：“中国民众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就能焕发出无穷的力量。”

“一年前大家都认为：日本想在中国得到什么东西就能得到什么东西。中国全部希望仅局限于用消耗战的方法来尽可能地阻止日本的掠夺。然而在今天，大家都认为，如果中国将其全体人民和资源都动员起来，继续团结抗日，日本就会遭到惨败。”

中国共产党已唤醒了民众，中国人民也及时认识到自己潜在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必胜。

斯诺夫人说：“无论谁，只要他看到中国的红军，看到日军后方的游击队，看到在日军炮火下英勇奋战的中国士兵，他就可以明了被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所具有的潜力，一旦明确了目的与方向，一旦具有了勇气与忍耐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就会不可思议地用自己的血肉

《红色中国内幕》第269~270页。

《红色中国内幕》第272、272页。

之躯筑成坚不可摧的伟大长城！”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以自己的全部身心，在地球上最少变化的文明古国中，创造着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

三、“觉醒了的中国”——一个西方记者眼中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的艰苦奋斗，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的历史，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结束了鸦片战争以后一个多世纪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结束了几十年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混乱状态，打开了国家统一的新局面。

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 20 世纪世界政治中最重大事件之一。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改变了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欢迎。但是，新中国的成立，也受到了国际反动势力的仇视。他们采取了经济上、政治上的敌对政策。

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了世界人民的热烈支持，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在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 and 文教卫生事业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觉醒了的中国》就是一本向西方国家介绍新中国的书，作者费里克斯·格林是英国进步作家、著名记者兼电影电视片制作者，长期侨居美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格林第一次来中国是在 1957 年。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对政策，进行信息封锁和歪曲，他来中国之前头脑中存在着对新中国的一些固有偏见。诚如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所写的：“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在美国流传的有关中国的假想和恐惧。我想我会看到一个极为贫困、极为肮脏和疾病丛生的国家。我以为那里的人民会因为警察国家的高压统治而怨声载道。”结果是，“我的想象和我的所见所闻是这样的不同”，“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像我第一次访华那样使我深受感动。”为了写这本书，作者于 1960 年夏天第二次访问了中国，在中国“逗留了近 5 个月，行程一万多英里。”采访的“有政府部长、三轮车工厂、政府部门负责人、作家”，“参观过学校、工厂、监狱、医院”。本书真实地记述了作者第二次访华的见闻和感想，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和人民的精神面貌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驳斥了当时国外资产阶级舆论对新中国的种种歪曲和诬蔑。

（一）经济建设成就显著

《红色中国内幕》第 273，279，283，290 页。

《毛泽著作选读》下册，第 691 页。

《觉醒了的中国》，中译本，北京出版社 1981 年版，前言，第 1 页。

《觉醒了的中国》第 6 页。

新中国刚成立时，在国民经济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以及长期战争的摧残，工农业生产衰落，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949年，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钢产量比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的92万吨，下降了83%。煤产量比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的6.188万吨，下降了48%。粮食比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的2700多亿斤，下降了25%。棉花比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的1700万担，下降了48%。

作者第二次访华时，中国已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超额完成了。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计划的21%，比1952年增长128.30%。平均每年增长18%。“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与旧中国的100年相比是远远超过了，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作者在书中谈到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工业增长速度快。作者写道：“1949年的中国，即使按照印度的标准，也是一个工业极端落后的国家。因为中国是白手起家的，所以增长的百分比可能看起来大得惊人，……然而，尽管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仍然是超出人们的预料的，也是史无前例的。”作者引用了法国贝特尔海姆博士的访华报告：“首先，我和其他研究经济的同事们最主要的感觉是，我们访问的这个国家正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向前迈进，在这方面，这个国家做出的成就，超过了任何其他地方所能做到的一切。”贝特尔海姆博士认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发展速度是快的，而且以后仍然在持续发展。作者写道：“差不多所有的工业生产部门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中国发展的绝对概念可以由下列事实表示出来，她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产煤国；在机床产量方面，她已经超过了英国和德国；在钢铁方面，她即将超过美苏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在棉花生产方面，她已经超过了美国。在纺织业方面，仅上海就超过了英国。”“如果能源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尺度，那么中国1959年的煤产量是值得—提的。煤是大陆中国的主要能源，这一年的产量是1949年以前最高年产量的5倍。”作者断言：“中国正在迅速地向世界强国的地位迈进。”

第二，农业得到了足够重视。作者写道：“新政府进行的治水、水利、植树巨大综合工程，加上铁路和公路的扩充，减轻了水旱灾的危害，这是新中国的伟大变化之一。”作者实地考察了当时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三门峡大坝。他写道：“过去，辽阔的黄河流域实际上同时遭受水旱之患。现在，三门峡大坝及其水库将使黄河保持一定的流量，灌溉下游4千万亩肥沃的农田。”“共产党人在1949年开始执政的时候，中国的工农业极其落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新政府当时感到，为了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基础，必须使工业以高于农业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是中国人也预见到最终将要缩小这二者之间的差距——但不是通过减慢工业发展的速度，而是要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中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前所未有高速向前发展，是因为在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发展了农业。”作者写道：“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人口每年增长2%，而粮食的增长率比人口

《觉醒了的中国》第94、95、96、91、94、367~368页。

《觉醒了的中国》第390，369页。

增长高出4倍以上。新政权成立之前，粮食产量的最高年份是1936年——1亿5千万吨。在新政府开始执政的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下降到11300万吨。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1953年，粮食总产量为16700万吨，1958年达到25000万吨（这是最后的准确数字）。”

第三，城市建设发展很快。作者写道：“中国目前房屋建筑仅就数量来说就是惊人的，我们去过的城市都是如此。新建的办公楼、旅馆、博物馆、学校、公寓、大学、体校、体育馆、体育场、游泳池如雨后春笋，其数量之多和建筑速度之快，非亲眼见不能相信。建筑（我于此道稍有一些经验）的技术质量毫无疑问比我在苏联见到的要好。

“就建筑的速度而言，中国人远远超过了当年美国实现美国化时的速度。到1954年，他们已经解决了有关建筑工程的组织工作、建筑工地的供应以及24小时连续施工等问题。”作者引述英国人卡梅伦的访华报告说：“当时的建筑速度如非亲眼所见是难以令人置信的；设计、动工、完工到投入使用，仅仅几个星期就造好了4座新医院、6座工厂和11座部委办公大楼。”作者写道：“卡梅伦在1954年就看到了中国人在建筑速度方面所表现的天才；我第一次领略中国的这种天才是在1957年，在1960年的今天，他们的水平又超过了过去的年代。”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1958年中央决定要在10个月内在北京兴建十大建筑。作者详细介绍了它们的建设情况。关于人民大会堂，作者写道：如果它是用10年建成的（即使有志愿者的帮助），那也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举。实际上从设计、施工、安装设备、美化周围环境到全部完工，仅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这实在是一个奇迹。”

第四，“技术的全面进步”。作者写道：“今天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反映出技术的全面进步”。“虽然中国还远远不能在生产的数量上满足她自己的需要，但是中国所需要的东西几乎没有她自己不能生产的，如她的铁路所需要的柴油机车、她的空军所需要的战斗机、她的陆军所需要的重型坦克、1万6千吨船只和电子计算机等。”作者引用英国的《中国贸易和经济简讯》说：“地质、开采和冶炼方面的技术正在不断地得到提高。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计成本和不相信效率的做法是荒谬的。……共产党中国采矿工业总的水平在过去10年中有了很快的提高；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技术差距正在缩小。事实上，共产党中国的一些做法堪与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比美……”作者写道：“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只限于矿业资源的开发或者认为科学训练被忽视了，这是错误的。进步是多方面的。”“中国的技术革命太广泛了，变化太快了，也太新奇了。”“中国人的科学禀赋和才能，能够满足一个现代工业国所提出的技术要求，这一点是没有理由怀疑的。”作者引述美国人T·C·曹的话说，考虑到中国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进行一次核爆炸是不会使人惊讶的。

（二）人民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觉醒了的中国》第374页。

《觉醒了的中国》第31~32页。

《觉醒了的中国》第33页。

《觉醒了的中国》第97~98页。

《觉醒了的中国》第91~92、88、94页。

“一五”计划结束时，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 1957 年达到 102 元，比 1952 年的 76 元提高 1/3 强，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 148 元提高到 205 元，提高 38.5%，农民由 62 提高到 79 元，提高 27%。

作者访华时了解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在书中给予了客观的反映。

第一，解决了饥荒问题。“中国一向被人认为是‘饥荒之国’”，“在旧中国，人民在饥馑中挣扎。”作者写道：“1949 年之前，救济中国饥荒的呼吁，美国人听得太多了。……在一般人看来，自然灾害和人口众多是中国不断发生饥荒的唯一原因。”

“人们很少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性质才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因素。封建的落后的中国缺乏必要的机械，无法克服这么大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国民党的腐败和军阀作风也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作者写道：“1960 年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曾经看到这个国家上半年遭受水旱灾害的情况。……熟悉旧中国情况的西方人士告诉我，如果在过去，像 1960 年这样的旱灾，加上前一年粮食歉收，可能会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作者驳斥美国报纸报道中国出现饥荒的谣言说：“没有证据说明像过去那样发生了大规模的饥馑，或出现了成群结队的难民和乞丐的情况。”作者说：“中国不会再现 1942 年那样的饥荒，我在北京接触过的西方观察家们也有同感。”

第二，城市居民成生活状况有很大改善。作者参观了上海。他写道：“从前，上海是以污秽和贫困窟闻名于世的。我要求参观上海最糟的贫民区。他们告诉我，最糟的贫民区已经在几年前拆除了。”作者参观了一个较差的住宅区，得到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干净的贫民区。……这里闻不到恶臭，也没有垃圾。住在这里的居民穿的也不坏。……我发现每个孩子看上去都是营养良好的（我在中国所到之处都没有看见儿童有营养不良的迹象）。从居民的外表看，他们住在这里，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穷，也不是因为失了业。其实，他们做着和新住宅的居民同样的工作。……这里的居民正等着迁居到新住宅区去。我愿意把这叫做‘有希望的’贫民区，在我的经历中，这是一种全新的贫民区。”作者写道：“后来我会见了街道委员会的主任。他告诉我，……过去的情形比现在坏得多。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那些年代，人民深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苦，……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1949 年以来情况有了改善，有了很大的改善。……再也没有挨饿的人了。人们再也不用担心通货膨胀了。”

第三，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作者写道：“现在许多农民在节日里穿上了‘礼服’，自行车也多了。我在农民的家里还看到了收音机和钟。许多家庭有成摞的新毛毯。……相当多的农民在银行里有存款，……10 年前，农民在银行里存钱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三）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

《觉醒了的中国》第 367 ~ 368 页。

《觉醒了的中国》第 367 ~ 368 页。

《觉醒了的中国》第 404 ~ 406 页。

《觉醒了的中国》第 122 ~ 123 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逐年增加了用于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资，仅作者第二次访华的1960年，国家用于教育和卫生事业的经费就达86.2亿万元，占当年国家预算的2.3%，其中教育经费为64亿元，卫生经费为22.2亿元。由于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农村、工厂和其他地方团体用于教育和卫生事业的投资比国家财政支出的经费还多。由于全国上下一齐努力，中国的教育卫生事业取得了明显进步。

作者用大量篇幅、生动的事例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第一，“一场文化复兴运动正在中国兴起。”作者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在世界上处于重要地位。因为中国人口多，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4以上。作者谈到了中国解放前的教育情况：“看看11年前的中国吧。5亿多人口中，文盲占了80%以上；虽然是一个农业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但是农村里却几乎没有学校。”作者写道，“可以想见，文盲问题是新政权必须发动大规模攻势来突破的第一个环节。……到1960年，即我第二次访华的那一年，成千上万的成人业余学校和新的儿童教育网已经显示了成效。教育部估计，这一年全国将有1.3亿万人（比1940年的美国人口还多1千万！）通过扫盲考试。教育部还估计，到这一年年底，全国的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30%（大部分是那些已经无力学文化的老人）。”1950年以前，小学入学人数最多的一年为略高于2350万，1960年达9100万，即几乎是最高年份的4倍。同一时期的中学入学人数从不足200万增加到1350万（即增加6.75倍）。……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由11万增加到81万，增长了7.36倍。15年以前，每年9000个中国人只有1人有机会上大学，现在800人中就有1个了。作者还参观了工厂的职工教育学校，他写道：“我参观过的每一个工厂都有厂办学校，这些学校为职工开办识字、算术到大学程度的工程技术课程。”作者认为，“一场文化复兴运动确实正在中国兴起，这不亚于一次文化爆发。”

第二，“公共卫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作者在谈到旧中国的卫生情况时写道：“那时，中国是一个疾病猖獗的国家，但是每2.5万人中才有一名医生。比如，有两个法国那么大的新疆省竟只有15名医生。”作者写道：“11年来，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作者引述了1957年9位英国医生的访华报告：“1949年至1957年，全国新建了860所医院（平均每个医院350张病床）。”“1956年，北京地区的产妇在分娩过程中的死亡率据说只有0.3‰，上海只有0.28‰……而1955年英国和威尔士的产妇死亡率是0.54‰。”“在北京，1949年的婴儿死亡率据说是117‰，1956年下降到37‰。”“1949年以后中国就消灭了霍乱，1950年以后消灭了天花。回归热已在北京绝迹，斑疹伤寒也接近绝迹……在东方大城市消灭这类流行病……需要对医疗力量进行巧妙的组织……和不小的科学能力。”“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相当成功地控制了肠胃病，如伤寒、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以及许多寄生虫传染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已经达到的卫生水平。”

作者本人也在中国参观了许多医院。作者写道：“我不得不承认，中国

《觉醒了的中国》等223~227页。

《觉醒了的中国》第319~321页。

的医院和其他亚洲国家、中东、拉美、非洲的医院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别。”

作者还谈到了中国消灭血吸虫病的情况。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这种骇人听闻的热带寄生虫传染病一直是中国南方的一大灾难。”他引述英国人梅格雷斯的报告说：“血吸虫病在 12 个重要的产粮省份流行。……这种疾病对产粮区的 1, 100 万人民造成了生理上和经济上的危害。……从理论上说，控制这种疾病似乎是容易的，但是做起来却极端困难，因为这需要特殊的组织工作，需要受到这种疾病威胁的人们全力以赴的合作。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获得了成功。”作者写道：“根据我在华南从卫生官员们那里获得的材料，到 1960 年夏天，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四）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的结束，人民从此成为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在巨大胜利的鼓舞下，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极为高涨，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作者在书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第一，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分析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时，作者写道：“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用他们的心身和精力，作出了这一切巨大的努力。……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是中国人民受到恐吓和洗脑，被迫参加国家工业化的工作；说是一小批权欲熏心的共产党领导人缠住了不情愿、不满的人民，并驱使他们违背自己的意愿。”作者在该书前言中写道：“只要在中国呆几个小时，谁都会感到这里有一种简直可以摸得着的勃勃生气和强烈的乐观情绪。我在中国人民的身上看到了欢乐和信心，这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作者引证访问过中国的英国人门德尔松的话说：“技术的基础不但是机器，而且是人：人是有感情的，人们对于某项规划的态度，可以是怀着敌意的，或者是漠不关心，也可以是满腔热情的……对于西方的工人，工业化总是带着奴役和剥削的意味。工业革命给人留下了惨痛的经验。但是，对中国人就不一样了。……当中国人谈论解放的时候，他们说的确实就是这个意思，即从半个世纪的恶梦中解放出来。……观看他们工作的情形，谁都会为他们的热忱所感动。”作者在几个城市参观了一些工厂，他写道：“许多工人的脸上流露出一种聚精会神的神情。每个人的都专心致志的干活，那种认真的表情就像是刚刚学会了某种新技术的学生。”

第二，知识分子对国家充满热情。作者写道：“西方人普遍认为，新政权底下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定是痛苦不堪的。”“即使表面上拥护北京政权，暗地里一定是反对它。”作者写道：“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觉。我和好几个知识分子谈过话，……我相信他们对政府的拥护是出自真心，而不是假装的。……从根本上说，他们对这个政府是满腔热情的，他们所列举的拥护政府的理由也是真挚的。”作者引用加拿大人威尔逊博士的访华报告说：“来

《觉醒了的中国》第 321 页。

《觉醒了的中国》第 323, 325 页。

《觉醒了的中国》第 101, 前言, 102, 76 页。

自旧社会、旧高等院校的许多科学家，现在都很活跃。”

第三，儿童、青少年和老人幸福欢乐。作者在儿童节期间到北京中山公园参观。他写道：好多儿童在做游戏、跳舞、欢笑，对表演的节目，又是叫好，又是鼓掌，场面之热烈令人惊讶。他说：这里的孩子们确实玩得很痛快。外国访问者每到一处，总有十几个孩子站起来抢着给让坐。这好象也是娱乐的一部分。”作者采访了一个幼儿园。他写道：情况介绍中也同样充满着无限的乐观情绪以及那种完成当前的任务就能获得人类幸福的信念。作者还对一些学校进行了访问。他写道：“我访问过的小学里都充满了活跃、欢乐的气氛。孩子们和老师们都显得心情舒畅。”在访问北京大学时，作者感到：“学生们的表情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鲜明的印象，这是快乐的人们所特有的表情。……人们朝气蓬勃，热情洋溢。作者在东北参观时，到过一个敬老院。他写道：“一般说来，看到风烛残年的老人总是令人沮丧的，但这里却不然。我们看老人们下棋，最老的 90 岁。他们看上去是一群快活的老头子。”

第四，社会风气良好。作者在中国访问期间，深深感到人们之间的团结友爱，讲礼貌，已蔚然成风。作者特别对不收小费没有碰上小偷这些好风气感到很惊奇。作者本人在访华期间经常把钱或贵重物品落在旅馆里，但都没有丢过。作者还引用一位外交官夫人的话说：“中国是她到过的能把珠宝首饰随便放在梳妆台上而不用担心丢失的唯一国家。”对于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作者引用他的翻译的话予以解释：“我不认为发生这些变化是由于法律的缘故。法律并不能使人转变。……人们内在的变化才是小偷小摸很少的原因——这个变化本身就是革命，这就是革命的意义，这就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四、中国留学生、华侨享盛誉

中华民族不仅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引为骄傲，本世纪以来，遍布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海外华人”也显示出中华民族惊人的智慧，非凡的才干，令外国人刮目相看。

据统计，目前海外华人分布在全球 120 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达 3000 万人，在世界经济、科技领域中有重要的地位。华侨和华人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美国、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美国的 100 万华人中具有大学以上的文化教育程度者占 46.5%，有 8 万多人是教授专家。如果说美国科技的发展以登上月球为标志，而参加登月工程的华人就有 1400 人之多。占阿波罗登月工程高级工程师的 1/3。美国著名大学中的 1/3 的系主任、美国机械工程学会中的一半以上的分会主席，以及美国最大的电子计算机垄断企业国际通用机器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不少人是华人。而 800 名高级科技人员中 55% 是华人。在美国有一句流行的话：美国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美国人的智慧在华人的脑袋里。

（一）“三钱”享誉海外

《觉醒了的中国》第 358、35、92 页。

《觉醒了的中国》第 226，235 页。

在旧中国，许多仁人志士为探求中国强盛的道路，有的抛头颅、洒热血；有的辗转他乡，出洋留学。如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力学家钱伟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就是这样的有志之士。

钱学森 1935 年留学美国，先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学习，翌年获硕士学位。后转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继续深造，成为美国“超音速飞行之父”、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的研究生。3 年后获博士学位。1937 年至 1939 年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工作。不久被推荐为美国空军科学顾问组成员。1943 年 11 月，钱学森和马利纳合作，提出了一份《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报告中提出了 3 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思想。1945 年，他随卡门去德国考察 V—2 火箭研制情况。1947 年任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教授，次年被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1949 年回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任教授，并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1950 年受美国政府移民局的无端迫害，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逮捕、拘留、限制、监视长达 5 年之久。1955 年 9 月 17 日返回中国，先在中国科学院任力学研究所所长，后到国防部工作。1986 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学森在世界航空科学史上影响很大，是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他在这一领域大显身手，是航空技术还处于黑暗时期的 30 年代。

1935 年，24 岁的钱学森，靠自己的节俭和清华大学的国外补助金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年后，他取得硕士学位，又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做了冯·卡门的研究生。冯·卡门是美国“超音速飞行之父”。在学习和研究中，钱学森除经常与冯·卡门一块研究数学问题外，还抓住点滴时间如饥似渴地攻读一些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有时每天要学习工作十几个小时。入院不久，他就参加了火箭研究小组，当时火箭技术在人类航空技术史上，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钱学森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投入研究不久，他就与马利纳联合发表了《探空火箭飞行分析》的论文，找到了一些飞行计算问题的解答。3 年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钱学森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并被留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当时他的声望仅在冯·卡门之下。

不久，美国军方委托钱学森进行一项重大的军事研究。于是他怀着一颗狂热而兴奋的科学之心，和马利纳一起投入了用火箭发动机推进导弹的研究课题。他们提出的报告和冯·卡门的备忘录，倍受美国军方赞赏，并完整地接受了他们的计划。美国空军曾高度赞扬钱学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钱学森的名字和他的老师冯·卡门联系在一起，从（冯·卡门）得意门生到亲密无间的合作者，共同在人类的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1 年钱学森与卡门合作，解决了圆柱薄壳结构在轴向压力作用 F 的大挠度失稳的问题，从而解释了以前理论计算与实际结果的差距问题。他们创造了“卡门——钱公式”。1949 年钱学森发表的关于核火箭技术的论文至今仍被信奉为该领域经典，卡门称赞他是“火箭技术领域的一位最伟大的天才”。1948 年钱学森被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1950 年 2 月钱学森在纽约发表了时速一万英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的火箭理论”，成为轰动全美的新闻人物。

正当功名成就之时，一个念头在钱学森的心中形成，那就是回祖国去，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直返大陆困难重重，他先要到香港。但他从英

国领事馆得知，签证困难。 1950年8月21日，钱学森飞抵华盛顿，造访美国海军军部次长金希尔，当金希尔问他为什么回大陆时，他非常坦率地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不愿意制造武器杀害我的同胞，这是这么回事。”钱学森刚离开五角大楼海军次长的办公室，金希尔就跳了起来：“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他无论如何能抵得上3师至5师兵力。”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几经周折，终于在1955年10月8日上午1时25分，钱学森一家乘火车离开尖沙嘴经罗湖踏上祖国的大陆。

回国后，他倾心于祖国的国防事业，著有《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等近200万字的学术专著，发表航空科技论文20余篇，为开创和发展我国国防现代化技术，培养研究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受到国家表彰。

钱伟长是一位在力学方面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早在加拿大留学期间，他提出薄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在国际上称为“钱伟长方程”。通俗点讲，在“钱伟长方程”问世以前，世界力学界在处理有关椭圆形壳体、圆形壳体、锥形壳体、球形壳体、筒形壳体等物体时，一种壳体就要用一个方程。而后，处理这些物体壳体时，用“钱伟长方程”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一年，他才28岁。此后，他又研究出薄板大挠度问题的摄动法方法，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用系统摄动法处理非线性方程，被称为“钱伟长法”。此外，还由奇异的摄动法提出边界层理论，受到了国际同行的极大重视。在广义变分原理方面，取得的成果也较多。另外，还编著了《傅氏级数之和》大表，包括一万个三角级数。

1935年，钱伟长大学毕业，1940年考取了用中英“庚子赔款”招收的留学生，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继续深造。于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美国，投在世界著名力学家、航空工程学家冯·卡门的门下。被聘为由冯·卡门出任所长的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员。接连获得了重大成果，成了冯·卡门的得力助手，薪金也一增再增。

在海外的成功不会改变钱伟长报国的一颗赤子之心，他在1946年向冯·卡门提出回国要求，对方以为他嫌薪金少，许诺再给他增加。

钱伟长在冯·卡门心目中有重要地位，但钱伟长想的是报效祖国。冯·卡门善意地告诉钱伟长：“中国还很穷，科学事业非常落后，没有资料，没有设备。回国后对研究工作、对前途是很不利的。”而钱伟长却说：“国家很穷，科学也不发达，正因为这样它才需要人才。”但冯·卡门怎么也不放他回国。后来钱伟长不得不以回国探望亲人的名义提出回国要求，冯·卡门只好同意，并让他把夫人和孩子一块都带来。

为了不引起冯·卡门等人的怀疑，钱伟长离开美国时什么东西都没带，只随身携带了一些重要资料，便悄悄登上了一条驶向中国上海的货轮。

不是他不愿意享受美国富裕的生活，也不是他执意要欺骗他的老师，而是他对祖国母亲爱得太深了！

钱伟长一回到祖国，就来到母校——清华大学。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北平，他这个教授几乎要靠借债来维持生活，可他还是几次拒绝了美国方面要他重新回去的聘请。

全国解放后，钱伟长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他是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及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理事长；并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全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还是波兰科学院院士，美国数学学会及美国航空工程学会会员。

钱三强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

1937年，24岁的钱三强怀着振兴祖国的愿望，前往法国留学，踏上了研究核物理的征途。

来到法国，进了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做了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学生。两位老师对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十分同情，不仅交给他知识宝库的金钥匙，同时还教给他做人的道理。钱三强身在异国他乡，一方面努力进行学习和研究工作，另一方面热情关心和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正义事业。

国外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加上钱三强超凡的才华，个人事业的成功指日可待，但随着中国解放战争的连连胜利，钱三强越来越思念自己的祖国，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应该为未来光明中国的原子能科学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旅法党支部的支持下，钱三强准备及早回国。临行，居里夫妇交给钱三强一份双双签名的鉴定书，其中写道：“……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近十年来，在我们领导下的这一代的科学人员中，钱三强是最优秀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三强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及我国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的组建，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等。

钱三强热爱祖国，艰辛开拓，毕生致力于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两弹”的研制，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建立和发展，为培养、吸引人才，为国际学术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登上诺贝尔领奖台

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是世界各国科学家广泛关注并梦寐以求的夙愿。海外华侨能赢得此项殊荣，表明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为中华民族争了光。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等，就是这样一些举世闻名的科学家。

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从而使基本粒子的研究获得了重大突破，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金。

费米（E·Fermi）曾经说道：“杨振宁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他跟中国古代著名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一样。能够结识他，深引以为荣。若说他是我的学生，诚愧不敢当。当我们一块儿共同研究学术时，我经常意识到他是一位悟性极高、确能举一反三的科学家。在普林斯顿近代物理研究院的许多专家中，我最赏识杨振宁博士那种不怕难，在解决问题时那样坚定持重和沉静的态度。这乃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人应该学习的。”

1937年~1945年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从霸占东北三省开始，吞并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中国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西迁，在云南省昆明市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宁在西南联合大学就学，并结识了李政道。两人志同道合，都喜爱理论物理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1946年两人都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一起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

当时，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已取得美国国籍，正担任芝加哥大学核子研究所所长。费米曾经在 1938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原子反应堆的设计人。杨振宁一心想跟随费米从事研究，曾在 1945 年底抵纽约时，直接去哥伦比亚大学求见费米，但费米正从事绝密研究，已不在那里。由于他不断的追求，终于在 1946 年 1 月听到了费米的讲课。但费米因从事“高度保密的研究”而不能指导杨振宁写学位论文，杨振宁从他不擅长的实验物理学转向他擅长的理论物理学，后来于 1948 年获博士学位，并在芝加哥大学任讲师。1949 年他又去普林斯顿大学，1955 年开始担任该校教授。

杨振宁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领域很广，他主要的兴趣则集中在两个方面：统计力学和对称原理。这可以从他的 3 篇学位论文的题目中看出来。学士论文是《群论和分子光谱》，硕士论文是《有序——无序变换对统计理论的贡献》，博士论文是《关于核反应和相符测量中的角分布》。他是一个多产理论家，在美国《物理评论》、《近代物理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

1956 年 6 月 22 日，美国杂志《物理评论》的编辑接到一份稿件，是一篇很短的论文，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是否是守恒的？还提出了几种实验方法，以便从实验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作者是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院的杨振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

当时，宇称守恒原理似乎已经彻底的证实，理论工作者历来毫无怀疑地把这条原理应用于基本粒子的研究。人们熟悉，左手和右手是对称的；物体经过平面镜成像后，右变为左，左变为右，也是左右对称的，这是空间的左右对称性。不仅如此，力学现象、电磁现象也都具有左右对称性。量子力学的定律也是左右对称的。总之，凡是现实世界上的一种运动，只要它的镜像中的运动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实现，那么，这种运动就称为宇称守恒的（或“左右对称”的），这是和空间左右对称性相对应的守恒定律。为了表达它，较方便的方法是空间变换。其中，把物体或物体过程用一组新的坐标来表述，这组坐标正好方向相反。这种坐标变换叫宇称变换，这种变换相当于在平面镜反射后再平行于平面镜作 180° 角的旋转。如果将坐标系反置后，物理过程的进行完全与未反置的坐标中的相同。那么就称宇称是守恒的。否则，宇称在那个物理过程中不守恒。

1954~1956 年间，在研究 K 介子衰变时，出现了所谓“ θ — τ 之谜”。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是因此而烦恼的首批人员之一，他们开始怀疑，是否被科学界久已承认且深信不疑的宇称守恒原理有问题？1956 年春天，他们查阅了大量关于基本粒子的实验材料，并进行了分析，想严格地寻找支持宇称守恒的资料。他们发现，有许多资料是支持宇称在许多不同物理过程中守恒的，但在所谓的“弱相互作用”的那些过程中，却没有任何迹象能证明宇称是守恒的。于是他们在 1956 年夏天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实验室物理学家来确定这个问题。

他们提出了几种实验的方法，最后采用的方案是用放射性钴 60 涂敷在冷却盐晶体的表面上，与晶体表面平等且离这表面约一英寸远处，有一层涂敷在玻璃真空室内壁上的有机化合物蒽。当钴核发射电子时，每个电子打到蒽上会发现微小的闪光，固定在低温设备顶部的光电探测器便进行计数。为了使钴核自旋方向取得一致，在完成去磁致冷后，有一螺线管套到低温瓶上，在螺线管中通几安培电流，产生竖直方向的磁场，在这个外加磁场中，由于

钴原子有很强的内部磁场，因此取得在外磁场方向中的一致取向。取向磁场与原来的致冷磁场互相垂直，前者对致冷晶体无加热作用。

这个实验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吴健雄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标准局做的。实验结果表明，放射性钴 60 放出的 β 粒子大多朝一个方向发射。这证实了一直被物理学界推崇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不是一个自然界的普遍基本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中，它并不成立。由于这一高难度实验获得成功，不仅使吴健雄在 1957 年晋升为教授，也使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共同获得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同年早些时间他们还共同获得爱因斯坦物理学奖。

后来，在 π 介子衰变、 μ 子衰变和 A^0 超子衰变中，再次证实了宇称不守恒。

从 1965 年起，杨振宁担任州立纽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李政道由于和杨振宁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从而使基本粒子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共同获得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李政道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研究工作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必用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别人已做过的工作，只要了解他在干什么，他的弱点是什么就够了。而需要知道的是目前已有的先进科学方法，重要的是要了解哪些是科学的重点。这些重点中又有哪些是他人还不清楚的，还有严重问题的。要下决心走自己的路，向还没有开辟的领域进军，这才能做出开创性的工作。”李政道和杨振宁所做出的关于现代物理学基本观念的修正，是卓越的开创性的成果。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曾赞扬他说：“这位青年学者的辉煌成就，证明人类高度的智慧阶层中，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创造能力。”

1950 年，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白矮星含氢量》。1950 年 ~ 1951 年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讲师。1951 年 ~ 1953 年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执教。当李政道在 1953 年离开普林斯顿时，院长奥本海默说道：“……看到他离开，我们十分不舍。他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有才华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在统计力学、核物理学和基本粒子物理学中的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知名人物，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鲜明、灵活的独特风格。”

奥本海默对年仅 27 岁的李政道的评价并非是一种过奖之词。李政道自从来到普林斯顿之后，立即与杨振宁合作，在统计力学和核物理学家方面解决了一些较为突出和十分复杂的问题，因而迅速成为一个相当有名望的理论物理学家。

1953 年，哥伦比亚大学聘请李政道为助理教授，不久晋升为副教授，随即担任教授，当时他年仅 29 岁，是这所大学中最年轻的教授。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后，通过互访和电话联系，与杨振宁保持合作。1953 年，物理学家为“ $\theta - \tau$ 之谜”苦恼的时候，他们两人决定为解开这个谜而努力。在分析了大量实验材料之后，于 1956 年夏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假设。

在当时，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李政道在诺贝尔获奖演讲中说道：“科学的发展总是在我们的旧宇宙观念和我们对新事物的观察之间的交互影响有时或许会在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现象中发现完全出乎意料的事物。”

假设被提出来了。验证这个假说的几种方法也被他们提出来了。要从实

验上验证这个假设，却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而完成这个重任的是一位实验物理学界的女杰——中国血统的吴健雄（实验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

这一实验的成功，使李政道和杨振宁在 1957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1958 年 3 人同获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物理学博士称号。

李政道和杨振宁推翻宇称守恒定律之后，拉比在 1957 年评论道：“就某种意义来说，在这个基础上，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结构被砸碎了；而我们根本不知道，再怎样把这些碎片凑在一起，拼出原来的图案。”但是，随着宇称守恒的取消，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理论导致爱因斯坦所没有达到的概括物质、能量和宇宙全部规律的统一场论的研究。

李政道多次来华讲学、探亲，介绍科学研究新成果，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丁肇中也是海外华人中的知名人士，他由于和伯顿·里希特各自独立发现一种新型的 J/ψ 粒子，而共同获得 197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国外科学技术界评论说，丁肇中是最有实验能力、最善于观察现象的第一流实验物理学家。美国《自然》杂志还评论说，丁肇中所从事的工作是沟通中美两国科技交流的一座桥梁。

丁肇中在 1959 年获得物理学和数学两个学士学位，1960 年获得硕士学位。接着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物理研究所当研究生，1962 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1963 年，丁肇中以博士和福特基金会会员的身份前往设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在柯可尼的指导下用质子同步加速器进行研究。柯可尼对实验工作的严格与耐心对丁肇中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这段日子以及后来再到日内瓦工作期间，丁肇中的典型生活情况是，一早起来在自取食堂里吃饭，然后一整天留在实验室里，直到夜里离开实验室，驱车 10 分钟回到他的公寓房间睡觉。

1971 年，丁肇中带领他的研究小组回到美国，开始在布鲁克海汶国家实验室进行实验，他们用了一台 33 吉电子伏特的同步加速器来寻找长寿命的、质量相当于 1.5 ~ 5.5 吉电子伏特能量的中性粒子。当时认为，如果这种粒子存在，那么它会衰变为电子——正电子对，它们的能量会在母粒子的质能上达最大值。为了做到这一点，探测设备的灵敏度必须达到能在 $10^6 \sim 10^8$ 个相类似而又无意义的事件中选出一个有意义的事件来。为了减少不需要的背景粒子，整个仪器用一万吨水泥和一万磅硼砂皂制成的廉价中子屏蔽起来。经过将近 3 年的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在 1974 年 8 月第一次觉察到这种新粒子存在的迹象，他们在分析：

$$P+B_0 \rightarrow e^-+e^++X$$

过程中的电子对体系的质量分布时，发现在 3.1 吉电子伏特附近有峰值，说明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其质量约为质子的 3 倍。由于丁肇中的小心谨慎，他们当时没有公布这一发现。1974 年 11 月 10 日，丁肇中到美国西海岸出席斯坦福大学的一次会议时，得到该校加速器实验室里希特小组也刚好独立地发现了同一现象，并已将新粒子名为 J/ψ 粒子，于是丁肇中立即通知他的助手发表他们的发现，并将新粒子命名为 J/ψ 粒子。其实在 7 月份，斯坦福大学也已得到有关数据，只是因检修机器而推迟了重新核对的工作。因此 J/ψ 粒子几乎是同时被发现的。

J/ψ 粒子的发现，很快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这一发现在物理学上的重

大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存在着第 4 种夸克，即“粲”夸克。从夸克模型看， J/ψ 粒子是由粲夸克和反粲夸克组成的强子。以前，人们认为所有已知强子都可能有 3 种夸克：上夸克、下夸克、奇异夸克以及它们的反粒子以各种形式组成。

丁肇中和里希特发现了 J/ψ 粒子的卓越成就支持了当今的弱相互作用理论，他们两人分获 1976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这一年度的诺贝尔奖又一次挑起了如 1974 年给赖尔和休伊授奖的同样问题。对于强调个人授奖的规定，引起了曾经共同参与这项研究的许多人员的报怨。美国《科学新闻》评论说：“参加实验工作的有好几十人，却只有两个头头分获了奖金。这会使大实验组织的领导人员受到越来越棘手的来自下属的挑战。”

1979 年，在德国汉堡，丁肇中领导他的小组又找到胶子，这是量子色动力学的一种重要证明，为统一强相互作用奠定了基础。

丁肇中已成为当代第一流的实验物理学家。他主持的德国汉堡电子回旋加速器研究小组，首先接纳了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到西方工作。他每次到中国讲课，听众都是数以千计。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汉堡工作，同时又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他说：“在汉堡，我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对于我的小组，我尽量挑选那些也喜欢刻苦工作的人。”

（三）在世界上赢得赞誉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进入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科学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成果近乎爆炸式增长。我国的科技工作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如捆绑式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人造卫星的发射与回收、电子对撞机的研制和使用等等。相当一部分科技成果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不仅如此，一些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留学海外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修瑞娟、倪以信、侯义斌就是这样一些有作为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修瑞娟是世界著名的女科学家，“海涛式灌注修式理论”的女主人，其科技成果在 1983 年就震惊了欧美发达国家。她现在任国际微循环联盟第一副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微循环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职。

微循环是指人体血液循环中，继大、中、小血管之后微血管的血液循环。微血管是纵横交错，结成网络的生命的长河，是一个奇妙的人体微观世界。也正是这个世界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过去称人死亡，皆因大脑坏死或心脏停止跳动所致，而其原因连世界上微循环研究的权威也提不出更令人信服的科学的见解。在这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正是我国的中年女科学家修瑞娟。

她开始接触这个世界，探索其奥秘的时候还是一个不满 30 岁的普通科研人员。

1965 年，一次罕见的暴发型流脑袭击北京。即时，修瑞娟刚从莫斯科第二医学院以“特优”成绩毕业，她随中国科学院一个神经介质组踏进了北京友谊医学院的儿科病房，每天坚持 24 小时对患儿甲皱微循环进行观察。不知过去了多少不眠之夜，她终于发现了一个从前医学界从未注意到的问题：当

患儿病情危重时，显微镜下竟找不到一支微血管绊，她断定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脑部微循环障碍导致的中枢缺血缺氧，在世界上首先找到了流脑患者微血管自律运动的类型和规律。不久，一种治疗流脑可以扩张血管和抑制血管痉挛的特效药物“山莨菪碱”问世了。它可以使微血管管绊中的血流由静止变流动，流速由慢变快，大大改善治疗效果，使脑流患者病死率由原来的 66.9% 下降到 12.4%。

1981 年，修瑞娟被邀请到美国进修，在密苏里大学微循环研究所工作，她每天都要紧张地工作 9 个小时以上，在两年间，完成了 20 项研究，其中 12 项创立新项目。她在研究中发现，人体微循环不像大循环那样只是简单地灌溉式灌注，它有自身的节律运动，这种节律运动就像大海里的波涛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而对组织和器官的最后一波，才是最有力的。就像海涛翻起的白沫一样。这一发现极有临床意义，一个人如果发生急性脑缺血或心脏缺血，一旦注入能改善这些障碍的血管活性物质。血液就会像海涛一样，被突发性冲击而激活。在研究中，她把微循环实验中获得的微循环理论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大量确凿的数据，证明了这一假设，假设的证实无异于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国际医学界。她打开了人类生命的“绿色之门”。

由于修瑞娟艰苦的努力，成果不断出现，声望也日益增高。

1982 年 3 月，修瑞娟领导撰写的论文《山莨菪碱抑制栓素合成，抑制粒细胞聚集，抑制血小板聚集》，在美国最权威的医学杂志《JAMA》上公布了。同年 4 月，美国的第 28 届微循环年会在南方城市奥尔良举行。修瑞娟作为微循环新星被邀出度，并作了题为《大脑定位横切后微循环对血中氧分压增高的反应性》的学术报告，受到赞许。1983 年 4 月，修瑞娟又在第 29 届微循环年会上宣读了《关于微血管自律运动的长期检测》的论文。

1983 年，在前西德举行的一次国际微循环专题讨论中，她的发现，即海涛式灌注理论被命名为“修氏理论”。这标志着中国微循环的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1983 年初夏，各国微循环研究的大师们聚集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城，准备成立国际微循环研究所。发给各国的备忘录上这样写道：研究所的 5 位发起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享有最高权威。他们是：

- 一、修瑞娟教授（中国）
- 二、格罗斯教授（美国）
- 三、阿尔福斯博士（瑞典）
- 四、梅斯梅尔教授（联邦德国）
- 五、英泰格里里亚特教授（美国）

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乌普萨拉上空，修瑞娟被一致推选为研究所的领导人之一。

1984 ~ 1985 年间，在英国、法国、前西德、美国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修瑞娟陆续提交 14 篇论文，她的微循环研究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科学家们由此预言，微循环的研究将对今后医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些现在难以治愈的心绞痛、心肌梗塞、脑血栓、脉管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以及癌症等，也极有可能在微循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由于她的成功，在美期间，美国许多公司以高薪聘请她留美工作。其中，一家公司聘她一周工作 3 天，年薪 8 万美元；一家公司聘她一周工作两天，年薪 6 万美元；一家公司聘她一周工作半天，年薪 4 万美元，合计一共 18

万美元。但她却没有贪图美国漂亮舒适的洋房，也没被 18 万元美金所诱惑，也不为美国的工作环境所动心，而毅然决然地拒聘，回到了祖国。她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祖国养育了我，为祖国服务是我的天职。我的事业在我的祖国，金钱不是我的追求，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我要让我的科研成果出在自己的国土上，把中国的微循环机构完善起来，使它永远超出美国水平。”

现在，成名以后的修瑞娟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以更加旺盛的斗志，百倍的努力，继续为人类的幸福，为祖国的医学科学事业，在奋斗在拼搏。

工学女博士倪以信也是海内外享有盛名的人物，她 1988 年被提升为教授，1990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1 年 1 月，她获得了国家教委“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学位获得者”奖状，并在授奖仪式上发言，向国家汇报了她自己的成长过程和体会。1991 年，在“三八”妇女节参加了“巾帼演讲团”，并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1985 年 8 月，倪以信被国家教委选派去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电机系进修。刚去不久，指导教师福阿德教授便安排她在专题讲座上介绍她在国内的博士论文及研究工作，倪以信讲了一个多小时，并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受到了教授们的好评。他们很快就让她开始了研究工作并采纳了她提出的方案，还委托她带一名硕士生，并为研究生举办“直流输电”系列讲座。一年后，倪以信被学校聘为访问副教授，继续工作一年。这一年她参加的科研项目是由美国电力研究院资助的项目，总投资约为 100 万美元。这个项目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在用直接法对电力系统作动态安全分析中计算发电机励磁系统的作用。这个课题在 70 年代末，美国能源部曾支持一家公司进行过，但最后的研究报告认为：目前还不能解决此问题。1986 年 10 月，倪以信接受这一课题时心里很紧张，一是课题难度大，许多“权威”解决不了的问题她能解决吗？二是时间紧，她 1987 年 7 月底要回国，总共只有 9 个来月的时间；三是工作量惊人，要从物理概念、数学模型、计算机编程、调试直到用实际电网检验，由她一个人独立完成；四是压力大，如果完不成，别人会对中国培养的博士生的能力、水平产生看法。而且在美国不像在中国，除了她的那位教授外几乎无人可一起讨论。

倪以信接受这个课题后，花了很大精力。详细地阅读和分析了已有的文献资料及科研报告，特别是原始数据，反复比较、思考，并逐一地核实他人的一些初步结论，看看是否真有道理。当她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教授，并提出初步解决方案时，教授充分地肯定“路子对头”。但方案的实施却不顺利，虽然物理概念清楚了，但过程中须作一个假定来简化计算，试了五、六种方案都不理想。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以及荣誉感给了她用之不竭的力量。在一个时期里倪以信每天工作 11 到 12 个小时，吃饭、走路甚至晚上上了床都在思考。通过不断的尝试、分析、比较，终于得到了一个较好的方案，试验了一批新数据都得到了较满意的结果。教授高兴逢人便讲他有两个“明星”，并请倪以信去吃饭。但倪以信并没有满足当时的结果，一是误差值还不十分理想；二是数值计算的可靠性还较差；三是软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她要求带一名硕士生，把数值方法加以改进，一面改善方案，并同时实现软件系统化。当时倪以信还要用英语教一门每周 4 学时的本科生课程，还担任衣阿华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联谊会负责人。1987 年 5 月倪以信把该课题试验阶段的软件全部移交给加拿大方面的科研人员。从 1986 年 10

月到 1987 年 5 月，前后 8 个月把这个课题完成了。在加拿大美国电力研究院主持召开了这个项目的研究交流会，会上倪以信作了 1 个小时的报告，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当会上加拿大专家们得知她 7 月底就要回国时，开玩笑地对她的教授说：“这下你的兵马少了 50%。”因为他们可以从倪以信的汇报中知道她挑了多重的担子。

在美国的两年中，倪以信不仅教了两学期本科生课程，还带了两名硕士研究生，完成了 7 篇论文（或研究报告），应邀作了“直流输电”系列讲座和三个专题讲座。由于在美国工作期间较好地完成了教学和科研任务，在对方为倪以信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副校长代表学校向她颁发了“名誉学者和顾问”的奖状，他说这是衣阿华州立大学成立 100 多年第一次给国外学者以这样的荣誉。宴会上，电机系主任幽默地说：“自从倪以信博士来到我们系，我感到我们系的教职员都变得勤快了。”福阿德教授则含着眼泪说：“倪博士说她到美国是来向我们学习的，但我们却从她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倪以信在美国时，有一次去加拿大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对方的一个科研组负责人暗示可以提供工作；另一次她的教授助手希望倪以信留在美国，工作由他联系；最后一次是教授试探性地问她是否再延长在美国工作 1 年，报酬优惠。对此，倪以信都婉言谢绝了。倪以信说：“我的事业在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归根结底要靠一大批脚踏实地在祖国大地上耕耘的人去一步步实现。党和人民把自己培养成具有博士水平的知识分子，自己理应多承担责任，多作贡献。如果醉心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贪图安逸享受，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和培养。”她还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更新是很快的，决不能吃老本，要不断前进，跟上科学技术的前进步伐。”

侯义斌，作为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第一批研究生，以其全优的成绩获得西安交通大学的工学硕士学位后，又于 1983 年 8 月考取了世界银行贷款名额，来到了荷兰爱因霍芬技术大学电机系攻读博士学位。进校第一天便受到冷遇。原来，一些科技较发达国家的大学，对于中国的学生质量和水平都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教授要他写一份大学 1 年级的计算机基础概念的知识报告。这分明是说：你能达到这个水准，我就承认你中国的硕士学位，承认你够讲师的水平。所以，这不是一般的测试，它关系到西安交通大学这个中国重点大学的国际声望，并关系到中国人的荣誉！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侯义斌想，国家借钱送自己出国深造，我绝不能给祖国丢脸。于是，他仅用了一个晚上就写出了一份从计算机组成与结构，到当前国际研究的发展趋向，再到他个人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的报告，洋洋洒洒 20 多页稿纸，远远超出教授所要求的水平。第二天一早便交给了教授，教授看后为之震动，连声说：“不简单，中国人不简单！”侯义斌初战告捷，为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人争了光！

随之，教授又给了侯义斌一个研究课题，这便是第二次对他的考验。侯义斌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充分显示了他的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因此，教授便顺利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博士资格申请。随后便是 4 个月数次的考核，于 1984 年 2 月荷兰教育部行文批准他为正式博士生。

在做博士研究课题时，侯义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几乎是每个月出 1 篇报告，当他把一份份报告分别递给校内 6 位教授审阅时，他们无一不对侯义斌的研究成果感到惊讶。他的导师逢人便夸：“侯义斌研究速度之快是惊人的！”

侯义斌几乎每天都要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 12 个小时以上,回到宿舍还要看书查资料。饭顾不上去食堂去吃,全靠牛奶面包。由于侯义斌的辛勤努力,仅用了两年 9 个月的时间就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完成了荷兰学位法规定的 4 年制博士论文研究,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这是在爱因霍芬技术大学没有先例的,就是在荷兰博士生中也是极少见的。因而,荷兰 3 家报刊先后 4 次报道了这一消息,在荷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当地华侨中更是反响非凡。在授学位那天,他们纷纷赶到学校参加了侯义斌的授学位仪式。其中有一位老太太是宋太龄主席的朋友,她是坐着轮椅来参加这个仪式的,老太太在为他献花时激动地说:“你在这里得到博士学位,给我们华侨争了口气,我们都为你高兴!”侯义斌不仅为中国人争了光,而且以他渊博的学识在国际上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争得了荣誉。

根据导师的要求及西安交通大学的安排,侯义斌取得博士学位后,继续在那里做博士后的研究。这时他更加努力了,除了指导一名博士继续从事他的博士论文课题研究外,他还对专用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以及人工智能等进行了研究。更令人振奋的是,这期间侯义斌在国际上创立了“系统全分解理论”;创建并证明了一个新的代数系统——三方元代数系统;先后出版了一部英文专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同行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认为他的成果对于工业界有很大的价值,成果被用于“PHILIPS”和荷兰政府的一些大项目中去,一些西欧教授也因此而建起了相应的课题研究小组。

侯义斌用他的工作实绩向荷兰人展示了中国培养的硕士生水平。因此,荷兰教科部和爱因霍芬技术大学决定:凡是西安交通大学派去的硕士毕业生,一律免去博士资格考试,立即享有荷兰博士生的待遇(享有工资)。这个特殊待遇,在荷兰和中国各高等学校中都是唯一的。

侯义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以优厚的物质条件竞争科技人才,一向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惯用的手段之一。此时侯义斌已成了他们竞争的对象。

荷兰一位从事设计自动化的人找到侯义斌,邀请侯义斌到他那里去工作,并许愿:只要侯义斌一到任,马上送他到美国参加一个合作项目。侯义斌不加任何思索,当场回绝。不久,美国参加一个合作项目。侯义斌不加任何思索,当场回绝。不久,美国 IBM 公司在瑞士研究所的两位博士又找到侯义斌,请他到他们的研究所去工作,并进一步劝他说:“你们的国家那么穷,实验条件又差,你如果回国,对你的研究和生活都是不利的。”但是侯义斌不为所动。1987 年 6 月,侯义斌圆满地完成了博士后研究,提前返回祖国。

1990 年 4 月,侯义斌到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并受国家教委委托在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在这期间(4 月 11 日),美国总统布什发布了一道行政命令:给持有中国护照的所有中国人以合法居留和合法工作等权利。侯义斌的朋友从加拿大给他打电话要他留在美国。美国加州一位教授也劝他留下,并说:“如果留下来做我的博士后,可以得到 4 万美元的年薪。”美国一家公司的经理找到侯义斌以 6 万美元的年薪相许。然而,侯义斌并没有为此而动心。考察结束后,按期返回了祖国。

为了祖国经济的发展,为了闯出一条以科研促开发,以开发养科研的新路,侯义斌义无反顾地拼搏着。

五、外国人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于 1978 年底召开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路子上已走过十多个年头。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无论同自己的历史纵向比较,还是和同一时期世界上发达国家横向比较都是非常快的。80 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成绩越来越受到世界上的关注。世界进步舆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正确,步子稳妥,成绩显著,前景乐观。泰国听众颂·沃拉篷在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来信中说:“我曾多次到中国访问,亲眼目睹了中国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为全球人民关注的中心。”

(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成功的”

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会发生僵化,阻碍生产力发展。解决的办法不是靠剧烈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而是靠社会主义改革。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因而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和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我们一度受“左”的思想干扰,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这种体制与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愈来愈不相适应。弊端越来越明显,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认识到,不改革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就不能发展,本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就失去活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成了空话。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决定进行改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实现了一个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对此,罗马尼亚《晨报》副总编米哈伊·米尔卡说:“在使中国停滞不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在政治特别是在经济上改变其战略的必要性。”“中国领导人从自身的错误以及东欧国家 60~70 年代改革尝试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表现了坚韧不拔和务实的精神。他们逐步抛弃了几十年来,一直禁锢其政治和经济思想的旧观念。”10 多年来,由于我们贯彻执行了包括改革开放在内的路线、方针、政策,把经济建设提到了中心位置,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进入了历史新阶段,短短十多年,综合国力、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对外贸易关系迅速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一部分人摆脱贫困走向温饱,更多的人越过温饱线奔向小康;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许多人正在富起来,更多的人则争先恐后地加入致富的行列。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民从实践中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确实是一条富国强民之路,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奥地利商会秘书长施图姆福尔 1992 年 1 月 23 日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表明,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43 页。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 1992 年版第 52 页。

所选择的道路即改革开放的政策是成功的。”比利时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亨利·李德尔汉先生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是成功的，中国走的路是对的。”

改革是以农村为突破口的。米哈伊·米尔卡说，“在中国，改革是从‘下边’开始的，首先从农村发起，之后再推广到其它领域”。菲律宾《世界日报》载文指出：“民以食为天，一个国家不管有多么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理想，只要是经济没有搞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政治就不会稳定，任何改革也就不会成功。由于历史的教训，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人民的温饱问题，但不明了中国国情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却要求将人权与民主问题作为优先问题来解决。中国不听他们的话，结果成功了。苏联听了他们的话，结果失败了。”

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 1991 年 9 月在苏哈萨克讲话时指出，“1979 年中国很明智地先推行了农业改革……他们成功地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使他们不必依赖外援生存。农业改革的成功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为他们成功地创立了在沿海地区以自己经济为基础的企业。”因此，德国记者彼得·赛德利茨撰文指出，相对来说，“中国经济成功和苏联失败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执行农业政策的各不相同，这就是造成差别的原因所在”。他说，“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得到充分利用，中国人对其田地精耕细作，因为这关系到各自家庭的利益。”菲律宾《世界日报》载文指出“中国当年改革当年见效，人民不但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且立即受到改革之惠。”

城市经济改革继农村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 80 年代中期展开。“政府在完善农村改革，取得几年的经验之后，又开始了更加繁重、复杂的城市经济改革任务。城市改革也采用了农村改革中的许多原则”。美国的朱克曼这样说。城市的百万家企业是中国生产力的集中代表，他们本当是生机盎然的，但一度被统得过死，管得过严，铁饭碗和大锅饭的管理体制捆住了手脚，无法起跑，更难起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了。

在开放方面，中国逐步开放了 14 个沿海城市，建立了 4 个经济特区，3 个三角地带并把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还于 1990 年宣布建立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区。对此，新加坡议员白振华评论说：“中国经济特区的改革计划，是中国政府很有远见和务实的政策决定，这对中国长远的经济改革方向和发展来说，是很有利的，也是很好的。”墨西哥的曼努力埃尔·门德斯也认为：“中国改革在对外开放方面是成功的，这为其带来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并开创了使用先进的现代化技术和企业管理方式的生产过程。”

尼日利亚专家阿巴·阿多·丹塔戈先生于 1988 年 5 月来华，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西非地区豪萨语的广播工作。在阿巴先生聘期满回国前

1992 年 1 月 19 日《人民日报》。

1991 年 9 月 29 日《人民日报》”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52、9 页。

1991 年 7 月 29 日《人民日报》。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11~12 页。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44 页。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88 页。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79 页。

夕，记者采访了他。谈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他说，你到商场购物，可以看到商品丰富，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的情景。你在大街上行走，人们的穿着打扮特别是新潮男女的新潮服装使你感到人民生活水平在日益提高，中国作为有 11 亿人口的世界大国，能够成功地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已经够了不起了，而且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真是举世瞩目。“这些事实说明，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是深的。”中国的成就使第三世界国家感到欢欣和鼓舞，同时为非洲各国人民振兴民族提供了宝贵经验。话题由浅入深，阿巴·阿多·丹塔戈先生说，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眼光敏锐，根据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不失时机地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大胆调整经济结构，实行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已经取得了载入史册的成果，尤其可贵的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而且注意将改革开放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从而避免了国家财政被少数人所占有，防止社会两极分化，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带来实惠。……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同时，改革开放的成功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极大提高。当今世界上发生重大事情，人们总是愿意听一听中国的看法和主张。”

由以上论述不难看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成功的，中国走的路是对的。

关于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外也有很高的评价，前苏联历史学博士库利克说：“为了坚持在约 42 年前中国作出的社会主义选择，中国领导人不是求助于意识形态教条和死守某种理论的呆板形式，而是把重点放在现实可能性和本国发展的要求上，并结合了本国的具体历史经验。”此外，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面，中国从资本主义国家中借用来的一切东西都服从于达到社会主义目标，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不允许改革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用一切办法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西方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用资本主义的经验建设社会主义。”

我国实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到了飞跃性发展。罗马尼亚《真理报》副总编维·瑟勒杰安和记者尼·朱利塔鲁撰文指出，当您看到中国十来年的时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时，如果您再对它固执偏见，“若不是愚蠢的，也是令人遗憾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也明确地说：“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学习中国改革的经验，中国是世界成功改革的榜样。”

（二）“引人注目的飞跃”

到 1992 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已走过 13 个年头了。13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它给国家带来的活力，给社会带来的变化，给人民带来的利益却是巨大的。到 1990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 17686 亿元，国民收入达到 14429 亿元，自 1979 年以

1991 年 8 月 19 日《人民日报》。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29 页。

《半月谈》1992 年第 4 期。

来，平均每年递增率分别为 9，7%和 8.4%。罗马尼亚《晨报》副主编米哈伊·米尔卡指出：“最近 10 年，中国在进步和繁荣的道路上实现了引人注目的飞跃。”墨西哥企业家、墨中委员会主席马里奥·阿贝特洛普也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

首先，工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农业是根本。没有工农业的首先发展，就谈不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治稳定，也很难谈得上其它各行各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逐步实现了农村改革和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加之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的工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此，库利克称，中国的改革“成功地使工业和农业得到同时发展。在 10 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2.3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12.6%，农业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6%”。

原苏联的库尔巴托夫评论说，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的农村改革，基本上废除了大型集体经济，把土地分给农民进行个体耕作，在改革中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他们有权支配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资料。政府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等措施对改善农民的农业部门的状况卓有成效，单位面积产量大大增加，劳动生产率急剧上升。特别是最初几年，各种产品的生产都持稳定上升趋势。1984 年粮食生产达到 4.07 亿吨，取得了创世纪的大丰收。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黄朝翰则认为，中国在改革中采取的包括政府以高的价格购买粮食、开设农村市场，让农民以“好的价格”出售超产的产品等一系列有利于经济成长的措施，对农业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他说，“不但农作物产量接连几年都持续增长，副产品的生产也普遍上升。在这段期间内，中国粮食的平均增长率达 3%，比 1.4%的人口平均增长率多了很多。”美国《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记者邵德廉也说，“农村经济成果最引人注目”。

在谈到农村改革时西班牙马德里科技大学教授罗伯托·森特诺指出：“在 10 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这种改革使农业人口的收入增加了 4 倍，并为随后的放开和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德国朋友彼得·赛德利茨也称，农村改革使农民重新占有了土地，在短暂的时间内向 11 亿人口提供了充足的粮食、羊毛、棉花和其它农作物，尽管中国只有 15%的土地适于发展农业。日本《朝日新闻》编委早房长治认为，“在中国农村允许土地私有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并举例说，在哈尔滨西面的肇东市，现在的农业总值比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前的 1978 年增加了 30%，畜牧业增加了 3.3 倍，乡镇企业增加了 11.5 倍，所到之处皆见耕作精细的农田、新盖起的农舍、大型塑料棚等。并特别指出，“这种生机勃勃的农村景象，在从沿海到内陆的全国各地均可以看到，尽管在 1991 年全国有 4 千万公顷农田遭到水灾及旱灾，但农业仍获得了丰收，产量居历史第二位。”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53 页。

1990 年 11 月 23 日《人民日报》。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27 页。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107 ~ 108、105 ~ 106 页。

我国农村的改革成就，也可以从以下的数字中体现出来：从 1980 年到 1990 年，粮食总产量由 32056 万吨增加到 43500 万吨，棉花总产量由 271 万吨增加到 447 万吨，农业总产值由 1928 亿元增加到 7382 亿元。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城市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安定团结。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黄朝翰认为，中国的收成好，对于占全国人口 80% 的农村地区的繁荣，以及超过 22 万个农村的小型企业的生存，都非常重要。农业上的优良表现，也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回弹。原苏联 A·普拉托科夫斯基在苏《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由于农业有了突破，中国改革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吸收外资、建立合资企业和经济特区也就取得了成就。

法国《费加罗报》文章说：“南方沿海城市发展令人惊奇，像一枚多级火箭。最早建立的 4 个经济特区 10 年内建立 3000 多家企业。第二级火箭是特区附近的中等城市，第三级火箭是沿海地区和内地首府。雄心勃勃的上海领导人要使上海成为中国的新加坡。日《朝日新闻》编委早房长治说：‘大连市将以日系企业集中投资为支柱在不久的将来努力成为东北地方的发展中心。拥有 3 个经济特区和两上开发区的广东省在 80 年代末经济力量跃居全国第一，山东烟台在其西部一块 10 公里的荒地上建成一个低公害的工业区，已与 30 个国家 155 家公司签订总额 3.5 亿美元的投资合同，目前正为建成一个 36 平方公里的工业区而努力。90 年代，沿海经济将以广东省、上海市和大连市为中心，其间连着福建省和山东半岛等地区，宛如一个硕大的花环开满鲜艳夺目的花朵。法国朋友乔治·苏菲尔撰文认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强国正在崛起，任何力量似乎都不能够阻止它。’”

其次，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重视这一点，改革开放中这一问题尤其得到重视并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

到 1990 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已达 714 元，是 1978 年的 4.1 倍，其中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 3.2 倍，城市居民收入增加了 80%。改革开放，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富”了起来，住上了楼房，房间里有了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有的甚至有电话、摩托车或小汽车。一些在 70 年代尚未“脱贫”的农民也告别了祖辈居住的茅屋和“食不饱腹”的处境，迁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实现了祖祖辈辈朝思暮想的“吃饱”“穿暖”的愿望并有了“吃细粮、住楼房、看电视、骑‘凤凰’（自行车）”的企求；在城市，职工收入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也使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现在，就全国总体来看，11 亿人口的绝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生活，并有许多地区已经向小康迈进。对于这一成就，许多外国朋友认为，中国能以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22% 的人口，并且使他们生活得很好，“的确是一个奇迹”。对于产生这一奇迹的根源，巴西经济学家、《环球报》经济专栏记者卡洛斯这样认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最直接的成效。

“漫步在北京街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朝鲜首都平壤参加各国议会联盟年度会议后来华访问的委地瑞拉官员奥·莱帕赫说，“我们不仅认真观察了行人的穿戴，而且注意了他们的面容表情，我没有见到一人

衣衫破旧，面色苍白，脸上带有明显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痕迹。而在我们这些自我标榜的拉美民主国家则随处可见。我们的感觉是：中国商品比较富足，人们丰衣足食，无忧无虑。”“1978年到1988年10年间，农村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随着食品的丰富，70年代8亿中国人每天吸收的营养为1650卡路里，80年代11亿人每天吸收的营养增加到2600卡路里。”美国的朱克曼用一组数字表明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罗马尼亚《真理报》副总编辑萨拉扬和记者米利塔鲁于1991年11月应《人民日报》的邀请来华访问。在他们回国后合写的《对中国不应该有偏见》的文章中称，中国的改革是活生生的现实，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中国在10年时间里取得的飞跃，使人民过上了富足的文明的生活，11亿人吃得很好，穿着也很好，而且有多余的粮食供出口。

波兰《共和国报》1992年6月发表了记者斯·格日姆斯基的访华观感。文章指出，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姑娘，衣着都很入时，看来都自信而满意，文章说，全中国，凡是他们去过的地方，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乡镇，到处都购销两旺。例如在繁华的上海南京路上，从一清早到晚上10点，各大商场和小店铺都是人群如潮，其景象不亚于巴黎的繁华区。文章对中国人民有那么多钱感到“不可思议”。对此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詹姆斯·麦格里戈认为，1978年开放门户时，中国几乎什么都需要，但他们的人民几乎什么也买不起，但过了将近15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美开乐服装纸样公司在中国的经销人康德雷尔说：“人们的口袋里有了钱，便要买东西买。”

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不仅使广大人民达到了“吃饱”、“穿暖”的要求，而且已开始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了。在饮食上，人们的食品结构已由量的满足转向了质的提高。鱼虾、家禽越来越多的摆上了人们的餐桌。日本记者荒井利明说：“虽然各地的情况不同，但在北京等大城市，以谷物为主食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人们对蔬菜、肉类等食品的摄取量在不断增加。”在穿着上，已由求同转向求异，无论男女老幼都以追求款式新潮、美观舒适的服饰为目的。而消费的热点则向高档耐用商品集中。“老八件”已进入饱和更新换代阶段，“新五件”（洗衣机、电风扇、电冰箱、彩电、录音机）的拥有量直线上升。原苏联历史学博士波尔佳科夫说，10年期间，除去价格增长因素，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了80%，而消费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举例说，不久前，彩电和电冰箱是绝对稀有之物，而现在城市家庭里每百家里就分别有52家和37家拥这些物品。并且这种消费现象在人均收入达630元的农村也初见端倪。

另据来自联合国的有关资料证实，“七五”期间，我国居民的消费和营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每人每天食物热值和蛋白质含量均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纤维消费量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每百人电冰箱、电视机拥有量相当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对此，蒙古总理达·宾巴苏伦访华后发表评论认为，“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世界意义。这是全世界人民走向美好生活和稳定以及全世界的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次，改革开放的成就，也表现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迅速扩大方面。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作

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逐步建立了包括海南在内的 5 个经济特区、开放了 14 个沿海城市，还于 1990 年宣布建立了上海浦东开发区。这在扩大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以致在 1990 年，美国的杨克曼赞叹道：“在世界平均零增长（联合国世经组织统计）的时候，中国大陆出乎举世预测，……外汇储备和外资注入猛增，对外贸易盈余 100 个亿，对外储备 400 多亿美元，造成了 90 年代世界的一个令人费解的二律背反现象。”

泰国坤通·因泰博士 1991 年 8 月在《号外》周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实行开放政策的直接成果，是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使各行各业普遍受益。并指出，1989 年，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以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方式引进外资项目约 1 万项，共计吸收外资 41 亿美元，上述特区出口创汇额高达 34.81 亿美元。此外，经济特区从内地引入 200 万劳动力，使内地就业矛盾得到了缓解。经济特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也明显提高，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已成为内地发展的示范和桥梁。文章说，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促使各行各业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开放政策使中国成功地走完了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步。

在扩大贸易方面，中国遵循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经济部长下村恭民说：“1990 年，中国的出口率增长了 18% 以上……进口减少了 31%，作为结果来说，外汇储备额急速增加，1991 年 3 月已接近 70 亿美元。”原苏联历史学博士库利克认为，“中国同西方国家贸易经济合作实际上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对外开放中，既要引进外资补充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又要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罗伯托·森特诺说，对外开放，“使大批的外商投资者拥向中国，兴办工厂、提供贷款和转让技术，他们拥有明确的谈判对象，明文的规定和做出的决定能够实施。”截止到 1989 年底，中国共吸收外国在华投资 154 亿美元，兴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已达 2 万余家。引进了大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工作。从而加强了我国重点项目和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建设。法国前部长，中国问题专家阿兰·佩雷菲特于 1991 年 11 月在巴黎一次晚餐讨论会上指出，中国的 4 个经济特区和海南特区，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用中国的劳动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对外开放政策的成效并不仅仅限于作为开放窗口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而且广泛地表现在全国各省份和地区，彼得·赛德利茨在德国《商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建立的经济特区，早就冲破了原有的特区的界限，向特区之外的沿海地区、城市和省份发展。”泰国的坤通·因泰博士也说，开放政策带来的可喜变化，已由经济特区发展到全国各地，使中国到处呈现了蒸蒸日上景象。

最后，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认为，因中国保持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其国际影响力水涨船高。

东亚哲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吴撷认为，自 1979 年底着重提出了加强民主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114 页。

《外国人评中国改革》第 14 页。

与法制建设的任务后，“中国在法制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文章指出，自1978年中国实行教育改革后，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语文教学、行政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库利克说，中国在发展自己防御能力方面进展很快，目前中国的武装力量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现代化飞机、核潜艇。在消减军队人数的同时，坚持奉行了全军全面现代化的方针。

在1992年的第25届奥运会上，中国以54枚金牌的成绩挤入“世界四强”。对此瑞士《日内瓦论坛报》文章认为：“沉睡的中国醒来了。”

总之，改革开放政策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成就是空前的。它像一杯神奇的营养液，使中国巨人的躯体活跃起来，睡狮猛醒、巨龙腾飞。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从僵滞的发展中走了出来；从贫穷的境地中走了出来；从封闭的格局中走了出来，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法国朋友安贝尔说，“中国的变化是地球上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

（三）“中国的前景将是乐观的”

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进步和繁荣的道路上实现了引人注目的飞跃”，这是举世公认的。90年代的10年，对中国来说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经过10年文革浩劫和改革开放13年来的反反复复，中国人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认识到，如果再不抓住机遇发展经济，迅速实现经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梦想恐怕永无实现之日，永远不能把贫困落后的帽子抛到太平洋去。”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年6月发表夏泰宁的文章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缓过劲来之前，加快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使中国经济成为国际经济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中国就有可能吸引到大批的国际资本，加速经济发展。在5到10年内实现经济起飞。”在90年代的巨幅画卷中，中国将以怎样的景观展现在人们面前呢？对此世界舆论见仁见智，评论纷纷，总体看来，他们大都和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亨利·李德尔汉先生的看法基本一致，即：“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中国应该在这条道路上坚持下去。只要中国能保持稳定，中国的前景将是乐观的。”曾任世界银行发言人的弗·活格尔也说，“我觉得，中国人会干得更好。”

从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来看，中国已经具备了加速改革开放的条件和基础。

从政治保证方面说：美国著名经济发展学家西蒙·库茨内斯在其《现代经济成长》一书中认为，在经济社会里，要经济成长，最低限度的政治条件为：一、在经济社会里，有些成员必须要计划将来的发展，所以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是必要的。二、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有解决各阶层利益冲突的能力，而且政府必须预先了解、发现这些冲突，并把它对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尽量减少。所以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面对于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政治状态无疑为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物质基础，原苏联历史学副博士波尔佳科夫说，中国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已积累了可观的有用资本，总的看来，改革能胜任摆在它面前的任务。

就思想基础而言：改革开放的几年使中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说，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改革开放步伐，已成为中共全党、全民共识，全国上下取得了难得的一致，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

至于体制方面，80 年代的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将对 90 年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巨大推动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经济将进一步发展。英国著名新闻评论员威廉里斯·莫格勋爵 1992 年初为英国《独立报》撰文指出，“中国经济曙光在望。”在未来 50 年中，将与亚洲国家一起，跻身于世界富有国家之列。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是令人震惊的。”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希 1992 年 1 月去日内瓦时说，中国经济发展成绩巨大，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日益广泛，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他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有巨大的潜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信心。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维诺德·托马斯指出，中国正值经济改革的大好时光，虽然目前中国还不是经济大国，但从她的潜力和发展速度来看，她必将在近几年内改变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成为一个强国。1991 年底，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今后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超过 10%。日本《经济新闻》展望得更远，认为到 2000 年，在亚洲创造最高增长率的将是中国。法新社援引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也称，在 90 年代的几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在亚太地区居领先地位。

1992 年 2 月 12 日《人民日报》。

1992 年 2 月 10 日《人民日报》

